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国古代图书

主编 王绍曾 罗青

鲁海 鲁军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計數相總數自二百廿錢以下錢由書

夫過二百廿錢以上到二千二百錢賞一盾

過二千二百錢以上賞一甲八戶無千一

賞一盾自二以上賞一甲

甲民私廟其籍及不備者人其籍

從之私而責其不備者私

29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国古代图书

鲁海
鲁军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济南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王绍曾 罗青 主编

中国古代图书

鲁海 鲁军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125印张 77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40

ISBN7—5328—0679—0/G·571

定价 1.20 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国内文化界对编写“中国文化史”引起普遍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在讨论如何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介绍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来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我们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而编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作为炎黄子孙，无不为此而骄傲。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古老文明，都是我们的祖先长期奋斗、积累的结果；没有斗争，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悠久的灿烂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辉的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祖国，为两个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部中国文化史，涉及到许多专门学科，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套丛书不可能兼收并蓄，只能就文化史上较为重要、较为突出、并为大家感兴趣的专题，分别作系统的重点的介绍。大体上包括考古文物、科技发明、典章制度、图书典籍、文教艺术、衣食住行、风俗礼制、宗教信仰、中外交

流、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曾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和探索，但作为普及文化史知识而编写的成套读物，过去很少有人做过，我们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具体，图文并茂。力求做到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结合。同时尽量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以适应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这套丛书，每册一般六至七万字，将分批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鲁军等同志。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在读者的帮助下得到改进。

三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

目 录

一、开卷话书·····	1
二、图书的萌芽·····	7
三、从刻石到石经·····	15
四、从“韦编三绝”话简牍·····	23
五、帛书的出现和卷轴制度的形成·····	32
六、造纸术的发明和初期的纸书·····	40
七、稀世珍品——敦煌卷子·····	48
八、古籍装帧的发展——从简牍到线装·····	53
九、图书的特殊类型——拓片·····	57
十、印刷术的发明·····	62
十一、宋代以后的雕板印刷图书·····	68
十二、印本时期的写本书·····	76
十三、册叶制度的版式和结构·····	81
十四、活字印刷种种·····	87
十五、彩色图书与套印技术·····	96
十六、丰富多采的版画艺术·····	99
十七、清代的公私雕板图书·····	103
十八、西方机器印刷术的传入·····	108
十九、翻译书小史·····	114
二十、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119

一、开卷话书

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成就中，图书的产生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造纸术与印刷术都与图书的发展息息相关。

谈到图书的发展，先要明确图书的概念。什么是图书？有人解释为“著作，有文字或图画的册子”，或“装订成册的著作”，这种说法不够完整。我们认为图书是指用文字、图画或其它符号在一定物质材料上纪录知识、表达思想的著作物。用作图书的材料，从古至今有较大的变化。图书在初期与书契、档案难以区分，但以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形态，它不单是用文字记录一定的内容，而且是以传播经验、知识，交流思想为主要特征。人类创造的文明，是依靠图书来积累的。前人的思想、科学、文化成果，如果光靠言传身教，只能传授很小一部分，也只限于两代之间的沿袭相传，而图书却可以长期流传，滋润后生。

同样是用文字、图画或符号记录在一定物质材料——现在一般称为“载体”上的还有档案、文献等等。档案与图书有较大的不同，档案用于记录、保存，图书重在传播，如果档案出版发行，流通于社会，这也形成为图书。所以，广义的图书概念也包括档案在内。关于图书与文献的关系，目前

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从内容上来划分，文献是图书中较有历史价值的部分。从这方面看，文献的范围要小于图书。但是，从外部特征来划分，图书可以独立存在，有装订成册的，有单页的（如帛书），有成卷的；而文献却可以是一部书中的一篇，或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从这方面来看，文献的范围又大于图书。

图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产物，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促进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进步的手段。从中国古代的图书来看，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记录了前人的创造发明，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卓越贡献。华夏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是通过图书作为主要媒介而传播的。图书的主要作用是交流人类思想，传播知识。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有了图书来记录和传播知识，人类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任何一项新的成就、一项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所谓知识是一代人一代人相继积累的成果，是“接力”式地发展的，而图书一直就是记录前人劳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没有图书的记录，只靠口头流传，社会发展的长河就将断流。

从图书的形态、外部特征来看，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人类社会物质和文化水平。从其内容来说，尽管它是精神产品，但无论任何一种载体，都是物质产品。某些图书还形成工艺品。因而，图书的发展史，也是物质在图书应用中的发展史。

我们这里说的中国古代图书，是指从图书的萌芽时期

——一般认为从殷商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为止。这一历史时期，图书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的漫长道路，人们估计总共产生了十几万种图书。这些图书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思想、政治、经济、文艺、科技各方面的成就，内容十分广博，这一方面可以从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各方面来进行了解。本书主要介绍图书本身的发展情况，即从图书的四个构成要素（文字、材料、形态和制造方法）谈起，来介绍书籍制度的发展过程。

产生了文字以后，才会产生图书。谈图书的历史，先要追溯文字的产生。

人类是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语言，为了记录语言产生了文字。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寻求表达思想、记录语言的形式，如曾经采用过“结绳”这一方法。《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以后，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记录知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最初的文字。

许多文献中说，仓颉创造了文字。仓颉也写作苍颉，他是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一般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独自创造的，他是把众人创造的文字，归纳总结起来的一个人。在《荀子·解蔽篇》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行者，一也。”意思是说，仓颉把众人创造的文字统一起来，这种说法可能接近于历史实际。

我国在什么时期发明了文字，还没有统一的结论。郭沫

若认为，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时代就是文字发明的时代。专家考证，半坡遗址已有六千年的历史，汉字大约也有六千年的历史。郭沫若认为陶器上的刻划，应该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认为：“近年以来，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口缘外，往往刻画着简单的文字，……这些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年之久。”（见《文物》1973年第2期）这不过是文字的初创时期，于省吾进一步认为我国文字可考的历史是在夏代的末期。

图书的产生是在产生文字以后，《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说明了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典”和“册”，无疑这时期已经有了图书，既然可考的文字成于夏代末期，殷商时期产生图书，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原始的商代图书没有传下来，我们还不知道当时选用的是什么材料，也不知用的什么文字，是什么形态。

《尚书》中的“商书”，《诗经》中的“商颂”，据认为是商代的文献。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历史辗转传抄而留下来的文字，并非商代文献的原貌。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经说过：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见《论语·八佾》）可见，这时候已经是难以见到殷商时期的图书。所以殷商时期的图书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历史，中国图书史上都是一个有待于解开的

谜。

本书把中国古代图书的发展，主要按图书制度分做萌芽时期、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册叶制度四大部分来介绍，而以册叶制度为主。

在没有发现商代原始图书的情况下，最早记录文字的材料，已经广泛发现的有商代的甲骨，陶器，青铜器和刻石。这些带有文字的载体，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图书，但其内容有些是完整的法律，宣言或记录大事，已经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因而称之为图书的萌芽时期。

通过长时期的实践，我们的祖先选用了木头和竹子做为写书文字的材料，从而产生了正式的图书，即简牍，周代的一些图书就是用的简牍这一形式，形成了简牍制度，它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以迄现代。

接着，我国又用丝绸的缣帛做为图书载体，但是“简重（体积笨重）而帛贵（价格昂贵）”，我们祖先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即以纸做为图书材料。从缣帛开始的图书形式——卷轴，到纸的运用形成了“卷轴制度”。卷轴所用的材料，从价值昂贵的丝纤维织物到物美价廉的植物纤维生产的纸，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大大加快了图书发展的速度，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造纸术发明之后，最初一个时期，图书还处于卷轴制度。甘肃敦煌石窟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卷子，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图书实物，它们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纸书的出现给知识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知识的深入促进

了纸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知识，图书的需求量增大，在这种形势下适应主客观需要，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印刷术，这给图书历史带来第二次飞跃。有了印刷的图书，才有可能使作为记录知识的图书得到广泛的传播，从古代少数上层人士掌握知识，发展到更多的人获得图书，而对图书的更大需求又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继雕板印刷术之后，我国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套色印刷术。

图书内容的增多，工具书的产生，使卷轴制度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人们在寻求改革，在不断探索，经过经折、旋风、蝴蝶等装帧形式的试验，产生了“册叶制度”（包括包背装和线装），这一改革大大便利了读书人，一直沿用至今。

图书在上古时期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很久以后才成为一种商品，尤其在印刷术运用于图书出版之后，才出现专门经营图书出版、发行的书坊。在整个古代，图书的产生分做三大系统，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刻，私人出版的私刻，民间营业性质的坊刻。

本书从以上几个方面介绍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发展。清代后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图书出版技术也传入中国，在传统的册叶制度中注入新的血液。而“西学东渐”，也仍然以图书作为传播的手段，从而出现了大批的翻译图书。在这一时期，新的图书类型，如报纸、杂志被引进，开始在我国产生、发展。本书最后也对这些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中国古代的图书，如果从殷商的甲骨算起到清朝末年，

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内容到形式有重大的变化，可介绍的知识极为丰富，本书只能作概况的叙述，但尽量吸收近年来考古、出土实物的新成果，使广大读者有个较完整的认识。

二、图书的萌芽

图书是在文字发展中产生的，最早的文字载体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青铜器，有人认为是陶器，但到目前为止，多数人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而甲骨是我国图书采用的最早的载体。甲为龟甲，骨即兽骨。

商代几次迁都，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所以商代后期也称殷。秦汉时期这里开始叫殷墟。

《史记·项羽本纪》里记有：“章邯使人见项羽，……项羽乃与期于洹水南，殷墟也。”

清代末年，耕种在洹水河畔小屯村的农民们在耕地时发现了一些甲骨，经研究鉴定，上面有文字，并且是三千年前的殷商旧物，这一发现成了轰动世界的大事。这些文字，称为甲骨文，这些甲骨成为最早的图书。

甲骨怎样发现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清光绪间的内阁学士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人，任国子监祭酒、团练大臣，精通训诂金石之学。有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身患疟疾，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购得一味中药“龙骨”。他发现上面刻有符号，像是文字，于是大量购进，

后经过研究，认为是殷商时期的文字。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31年《华北日报》，以后被广泛引用。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提出北京当时并没有“达仁堂”这么个药房，出售的“龙膏”上面也没有文字。尽管这样的传说并不可靠，但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和收藏家，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王襄在《题易稽园殷契拓册》中说：

“当发现之时，（小屯）村民收落花生果，偶于土中检之，不知其贵也。潍贾范寿轩辈见而未收，亦不知其贵也。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筒，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板。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见《簠室题跋》，刊1935年《河北博物院画刊》第85期）

1955年王襄在《簠室殷契》一文（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中谈得更加具体。因此有人认为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是王襄和孟定生。事实上王懿荣也好，王襄、孟定生也好，很难说他们孰先孰后。研究甲骨文的专家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既肯定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和收藏家，同时又承认：除王懿荣外，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的，应推孟定生、王襄。这个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甲骨的内容，多半是占卜的纪录，一般叫它甲骨卜辞，也叫契文、龟版文、贞卜文、殷墟文字。无论上述诸说孰是孰非，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年的古代图书，终于在这一时期重见天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新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般认为，这批甲骨出土的地方是当年殷商首都的一个“档案库”。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是从公元前14世纪盘庚十四年迁都安阳到公元前12世纪帝辛灭亡前这一时期的记录，前后历时270年。从1898年至1985年，出土的甲骨共有15万余片，有5000个字左右，其中见于《说文解字》的有900多字。

甲骨的内容大部分是卜辞。殷人非常迷信，无论祭祀、战争、疾病、做梦都要占卜。每当占卜时，把乌龟的腹甲或牛骨凿薄成槽，然后放在火中燎烧，于是出现了裂纹。卜人就根据这些纹状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名字、所问的事情、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上，形成了一条“卜辞”。（见图一）

也有一些甲骨不是卜辞而是纪事。从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内容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一、向帝王进贡的礼品、数量；二、征伐战争的记载；三、祭祀的记载；四、宫廷大事的记载；五、狩猎的记载。以上这些内容，对我们掌握殷商时期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了原始文献。所以甲骨卜辞虽然还不是正式图书，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殷商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具备了图书的特征，我们把它称为图书的萌芽。

多年来，除河南安阳以外，如河南的洛阳、郑州、陕西等地方也有甲骨发现。陕西出土的甲骨已达一万多片，时间从殷商延续到东周时期。周代的甲骨有的上面凿有穿孔，据认为可能当时是为了把几片或几十片甲骨连在一起所用。这样，后期的甲骨与正式的图书——简牍已相接近了。



图一：兽骨卜辞（约公元前1300年）

古代文献中如《尚书》被认为是商代写成的，但是从已发现的甲骨文来看，还没有如《尚书》等完整的文献，因而殷商甲骨是否是最早的图书，为学者所怀疑。

1986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郊一处龙山文化晚

期的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一批甲骨，1987年又再度出土一批，经考古学家们鉴定是4500年以前的文字，它比殷墟出土的甲骨要早1200年以上。这批甲骨的深入研究将改写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图书的起源。

我们的祖先在寻求记载文字的材料时，金属和陶泥也都选用过，记载在上面的文字，分别称为金文和陶文，金属中的青铜器及其铭文，陶泥制成的陶器及陶文，同甲骨卜辞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图书的作用。

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为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奠定了基础。在金属冶炼中首先发明了红铜冶炼术，接着进入了青铜时代。有趣的是，我们的祖先为了把一些政治大事、文件、知识保存下来，以便流传后世，在铜器铸造中把有关的文字内容铸在上面或刻在上面，叫做“铭文”，形成图书萌芽时期又一种图书的类型。（见图二）

青铜器在我国从夏朝末年流行到西汉，即公元前1300多年到公元元年左右。郭沫若把青铜器时代分做五大时期：

一、滥觞期——大致相当于殷商前期。青铜器在夏代仅是简单的工具、兵器，上面还没有铭文，它与图书无关。到了殷商前期，铸造技术有较高发展，铜器类型也有增多，开始出现简单铭文，发挥图书作用。

二、勃古期——殷商后期至西周前期。青铜器花纹美观，可作艺术品看待，文字也逐渐增多，作为图书的观念也更强烈了。



图二：青铜器铭文

三、开放期——西周后期至春秋中叶。艺术性削弱，不崇尚美观，但铭文很多，许多是百字以上的长篇铭文，成为重要的文献。

四、新武期——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铸造技术提高，装饰多样。这一时期，许多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存世的，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远纪念的，往往铸在青铜器上。

五、衰落期——战国末年以迄秦统一之后。青铜器又从艺术品、文献载体回到实用品，铭文日趋减少，再不起到图书的作用。

但是，我国著名作家、学者骆宾基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在《金文新考》一书中提出，事实上金文要早于殷墟的甲骨文。他认为，金文产生于公元前2300—2400年之间，即炎黄五帝时期。他将殷墟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对比，得出这个结论，并且指出，鲁迅等人早已做了论证，但未引起广泛重视。骆宾基的研究成果如果获得广泛承认，中国古代图书的起源也将改写。

从图书的角度来看待青铜器，主要是研究“铭文”，它也称做金文、钟鼎文。已发现的青铜器铭文，属商、周两代的共约3500个字左右，已经得到解释的有大约2000个。

从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来看，包括纪念祖先、赏赐土地和奴隶、战征记功、书约、法律条文等。每一件青铜器铭文，少则只有一个字，多者三、四百字，“毛公鼎”上有492字，已是一篇长文献。

西周以及西周以前的文献，直接流传下来的为数极少，

现存的青铜器铭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并可与传世文献互相进行校补。如《周礼·地官》中有：“质人掌城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质（yù）者，质剂焉。”就是说，在周代奴隶与牛马、物品一样，都是买卖的货品。周孝王时代的“智（hū）鼎”上面有一段铭文，记有“我既买汝五夫，用匹马束丝”，意思是用5个奴隶来换马。现存的铭文可以为《周礼》的记载做说明。又如《诗经·商颂·殷武》中的“挾彼殷武，奋伐荆楚”，记下了武丁的南征。而商代青铜器“般鬲（yǎn）”上的一段铭文也可作证。

青铜器铭文中的许多铭文都是重要文献，如著名的“虢（guō）季子白盘”铭文记载了子白与西北少数民族狁（xiǎn）狁（yǎn）作战的情况，可以补充历史文献的不足。岐山发现的“𩇑（zhēn）匜（yǐ）”铭文是一篇诉讼的判决书。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8组64件编钟，上面的铭文是现存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

我国发明冶铜术后不久，用铜制镜，在玻璃发明以前一直为群众使用。铜镜上也有铭文，汉以前字数不多，汉代铜镜铭文内容广泛，字数也较多。如现存一块东汉铜镜，除花纹、十二干支名称外，有55字的铭文：“尚方御镜真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上有仙人以为常。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

青铜器铭文远比甲骨卜辞内容丰富，许多是完整的文献，

作为萌芽时期最初的图书来说，它与甲骨、陶器相比，最符合图书的概念。

陶器的产生早于青铜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测定为公元前4000年之物。殷代陶器开始有一些符号在陶器上，是否属文字还有争论。李济就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陶器碎片进行了研究，认为是春秋时期所生产，上面的文字考证为“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龟”。这表明，至少在商代已用陶器来记事。这与青铜器铭文的作用相同。可能由于陶器易碎，所以从出土陶器上的陶文来看，有关重大政治事件，起到文献作用的陶器还罕见。

多年来出土的陶器上的陶文，汇集以后得800余字，少者每件一字，多者也仅二、三十字。秦代的陶文有的具有文献作用，如现存的一块陶器碎片，上有秦小篆40个字，是秦始皇的一个诏令：“……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灋（fǎ）度量则，不壹歉疑者，壹明壹之。”已是一篇正式文献，同样发挥了图书的作用，成为图书萌芽时期又一载体形式。

三、从刻石到石经

石头是自然界存在的天然材料，我们的祖先在发明了文字以后，对需要记录下来的语言寻求较好的保存途径时，创造了把文字刻凿在石头上的方法。人们把字叫做“石头的

书”，可与“青铜的书”相比美。

把字刻在石头上，后人根据形状分做三种类型，在天然山石上刻文字叫“摩崖”，把石头加工成长方形再刻上字叫“碑”，加工成上圆下方的形状叫“碣”。

在石头上刻字，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还不能断定最早开始在什么时代。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石书”，是10个形状似鼓的石头，人们把它叫“石鼓”，石鼓上面的字体属于籀文，也叫它“石鼓文”。（见图三）

这10个石鼓大小不一，高度自45公分至90公分不等，横切周长平均210公分，四周刻有文字。每石约刻韵文70字，直列9至15行，每行有5至8字。文字的内容是四言的古诗，记载了春秋时期秦国游猎的事情，如其中的一段是：

吾车既工 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 吾马既宝

这10个石鼓是什么时候刻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唐代的韩愈在《石鼓歌》中认为是周平王时代所刻，宋人沈括、赵明诚认为是周宣王时代之作，元代陆友则说是西魏作品，明朝杨慎认为是秦襄公所刻，清人姚文荣则认为是北魏时期的产品，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代的学者根据字体和出土地点加以考证，认为是公元前7—8世纪秦国所刻。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八年（前770）之作。（见《石鼓文研究》）

这10个石鼓，唐朝初年发现于陕西凤翔，后辗转收藏，现珍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箭亭。经历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



图三：石鼓文

已有许多字漫漶不清，第八鼓已一个字也没有了。幸好，保存了一些拓片，现在能见到的最古拓片是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北宋拓片，当时尚存462个字。

古代各国相争时，往往用祈祷方式来咒诅它国。《周礼·春官》中写有：“诅咒，掌盟诅……以质邦国之剂信。”发现于陕西凤翔的一块石刻《巫咸文》，共326字，就是公元前四世纪末期秦国的一篇“诅楚文”，同时发现的还有《厥湫文》、《亚驼文》两篇。这三块石刻已不存，但《巫咸文》、《厥湫文》两篇有宋代拓本被保存了下来。

相传三代时已有刻石，但多数人持怀疑态度。能确定历史年代的刻石，除上述以外，可以相信并有实物可证的是秦代刻石。秦代，除了利用青铜器铭文以记事外，还利用刻石做为记事方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为加强统治，到各地巡视，立石多处以记其事，并颂已功。从公元前219年至211年，共立七石于山东的峰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芝罘山，河北的碣石和浙江的会稽。秦始皇亡后，其子秦二世在李斯等人陪同下也巡行全国，并在秦始皇所立刻石上进行了补记。秦代的刻石现残存二处。泰山刻石仅存碎块上有9个半字，珍置于岱庙之内。琅琊台刻石到宋代已残，明拓本仅存13行86字，每字约3公分见方，内容全为秦二世所刻补纪。清代，秦琅琊刻石失蹤，民国以后诸城人孟昭鸿在荒野及海滩上将寻得的断裂多块的秦碑重新粘合存于县内，建国后珍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

物馆，隐约可见44字。

从残存的瑯琊台刻石与传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相核对，文字略有不同。《史记》的记载是：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现残存的刻石中，原文为：

“……‘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此处不同，是司马迁原文的误传还是《史记》一书流传中版本的讹刻，尚不明白。但刻石文是最可靠的。

石刻和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一样，起到了保存历史文献的作用。在古代，除国家大事采用刻石以誌外，最多的是墓碑，碑文除人的姓名官职等外，许多有人物的传略，也是重要文献。除墓碑外，利用碑、碣、摩崖等刻石形式来对名山胜蹟进行题字或题诗、题词也十分流行，我国的各处名胜古迹都留有这样的一些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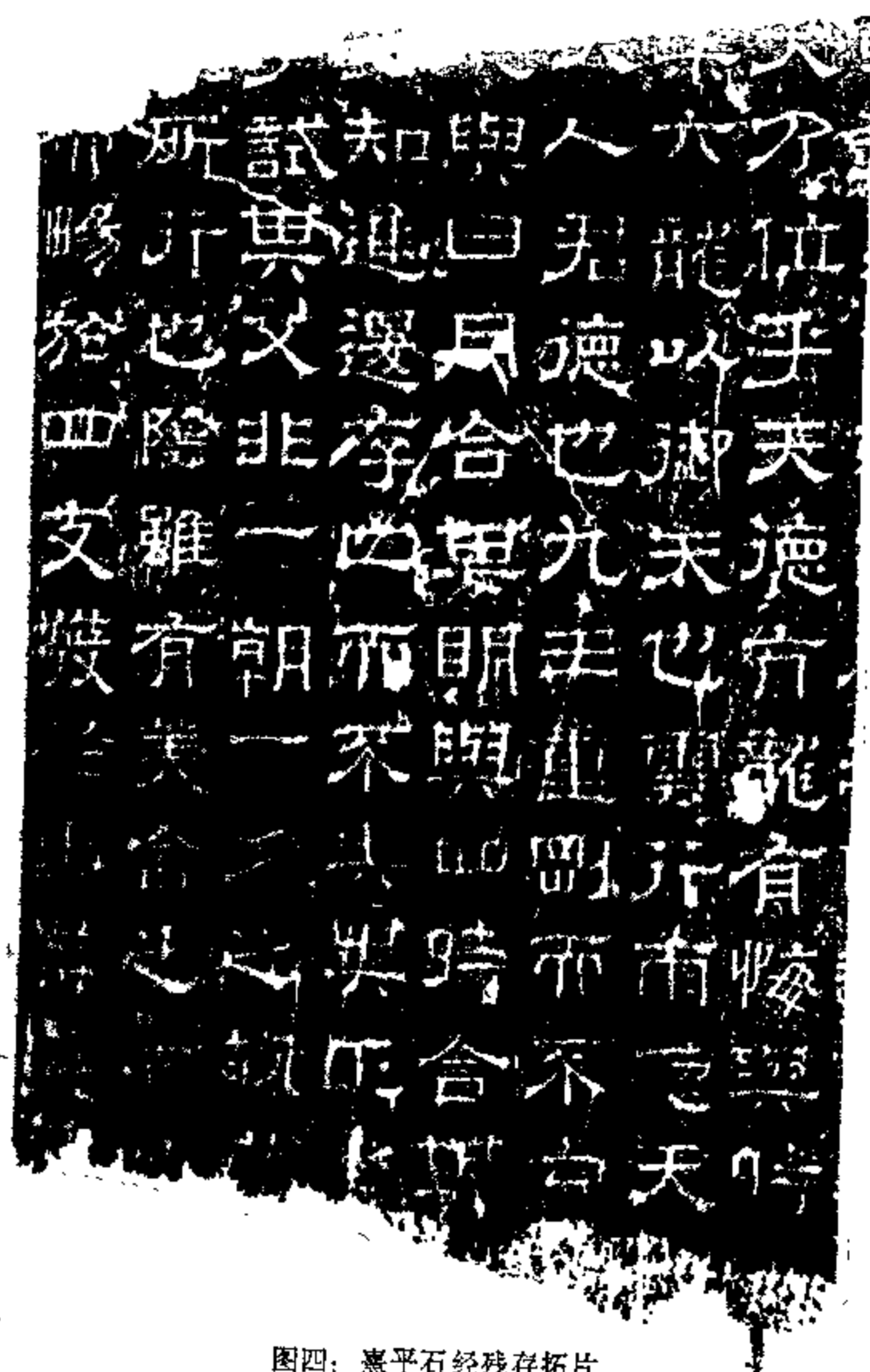
因为石质坚硬，形体高大，可以长久又清楚的保存，所以几千年来刻石历久不衰。今天仍然不断树立一些碑碣，刻有纪念性文字或名人诗词。历代刻石数量甚巨，仅北京图书馆所藏拓片即达数万件。1988年从中选印20000余种，其中秦汉200余种，三国迄南北朝1200种。

图书的特征之一是“著作物”。一般的刻石还是片言只语，形不成“著作”，自汉代开始在刻石的基础上，镌刻整篇著作，成为完整的著作物，这主要表现在“石经”这一特定类型的图书。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但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做为理论的基础，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又做为科考的内容。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都是手写，辗转相抄，每转抄一次，难免出现错讹损益，以致鲁鱼亥豕、矛盾混淆，由于不同的抄本、导致发生争执不下，莫衷一是的局面。为了统一内容，极需一个“标准本”，东汉熹平年间（172—177）决定把儒家经典，做效刻石的办法，全部刻在石碑上。《后汉书·蔡邕列传》中说：“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缪，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把整部著作刻石以存，这是学术史上一件空前的巨作，它不仅持久而正确的保存了儒家经典，同时也导致了以后的雕板印刷。

熹平石经，始刻于公元175年，历时八载始成，经文在石碑正反面均有，立于洛阳太学之东。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纷纷前来洛阳，以这个“标准本”来校核经书。《后汉书·蔡邕列传》中说：“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来读书的人数之多。

熹平石经共刻了7部书，即：《易》、《诗》、《书》、《礼》、《春秋》、《公羊》及《论语》。文本是从汉代流传的诸本中精选的，由蔡邕手书，隶体。熹平石经，一般认为共46块，全书20多万字。碑高约175公分，宽70公分，厚12公分，每碑每面有36行到40行，行70至74字。（见图四）



图四：熹平石经残存拓片

熹平石经完成不久，遭董卓之乱，开始遇到损毁。三国时，魏文帝下令修补石经，但以后又多次遇到破坏，自隋唐后，原碑湮没无闻，不可寻迹。到宋代，始发现《诗》、《书》、《礼》、《公羊》和《论语》五经残石，存2167个字，被收录于洪适的《隶释》、《隶续》二书中。到本世纪20—30年代，在河南洛阳原东汉太学故址又有多块残石出土，建国后马衡先生作《汉石经集存》汇得8千几百字。上海博物馆解放后收藏了熹平石经残石两块，是以前未被人发现的。二石共存239字，内容均是《诗经》。《诗经》传至汉代共有四家，即齐、韩、鲁、毛四氏。经魏晋至唐宋，韩、鲁、齐三家所传《诗经》均佚，仅余毛诗。上海博物馆获得的熹平石经残石，经考证竟是失传多年的《鲁诗》，从中得知《鲁诗》的一些情况，弥足珍贵，也正说明了石书可以历久不坏的优点。

古代还选用了玉石做书写的载体。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玉符，上面就有文字。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或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互相约束，往往向神盟誓，并把誓辞写在玉石上，叫“载辞”也叫“载书”。许多大事也有誓辞。1942年，河南发现了几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书写的文字，即古代的载书。

1965年冬，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大批盟书，都是写在玉石上的，人们称之为“侯马盟书”。这批玉简一共有几百件，是“圭”形，以朱色或墨色书写，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形态规整，玉石是深灰色。

对这批玉简中的盟书，各家解释不一样。郭沫若认为是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章和赵武公之子赵朔争位时的盟书；唐兰认为是公元前424年赵桓子嘉盟书或是三家分晋前赵氏兄弟叔侄所立的盟约。

从已出土的玉石图书来看，内容包括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盟书的盟辞长短不一，从十余字到二百余字。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古代图书。

四、从“韦编三绝”话简牍

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包括陶文）、刻石虽然具备图书的某些特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但它们还只是图书的萌芽雏形。谈到中国古代图书的发展史，最早的正式图书应是简牍。大约产生于商代末期的“简牍制度”，流传既广，影响又深，它一直延续到汉代，约有千年之久。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由于读的次数多了，就把竹简写的《易经》编连的牛皮绳——“韦编”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说明了当时的图书是什么样子的书。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文中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

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一般认为，简牍始于商代，盛于春秋、战国。王国维认为甲骨及金文中已有“册”字，说明殷商已有简牍。《周礼》中已记有“方板”，《墨子·明鬼篇》中有“书之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也有“先王致理于帛书。”都可以说明竹简与后面谈到的帛书在周代已很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思想、学术领域十分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政治家、思想家，为了发表自己的主张，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图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终于发现竹子和木头适于在上面书写文字，价格也低廉。

“简”，一般是指用竹片做成的图书，也叫做札，牒。在北方缺竹子的地区，也有用木片来代替的。“牍”，是指用木版写成的图书，也叫方、版。在不同的文献中，对一些术语的概念往往不尽一致。

先说一下简。在《后汉书·蔡伦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中解释“简”为“牒”也。第一部词典《尔雅·释器》中说：“简谓之毕。”可见简也叫做牒、毕。还有一种叫法“札”，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说：“札，木简之薄小者也”。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牒，小木札也。”

怎样用竹、木加工成简牍。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

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汉代的另一位学者刘向在《别录》一书中介绍，做为图书材料的竹子，不能用鲜竹，因为新竹多汁，容易朽蠹（dǔ）。在作成竹简之前，先用火来炙乾，把竹片中的汁烤干以后，去掉了原来的青色，写成书才不受虫蠹，这在古代叫做“杀青”，加工后叫“汗简”。

“简”和“策”是什么关系？有不同的看法，郑康成在《仪礼注》和杜元凯在《左传注》中都认为“策，简也”。即简就是策，是同物异名。蔡邕在《独断》一文中说“策者，简也。”持相同看法。晋人杜预在《春秋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牒而已。”虽然认为简和策有所不同，而只是内容上的不同，形式上仍二者一致。孔颖达在《尚书疏》中引用顾彪的说法“二尺四寸为策，一尺二寸为简。”也承认二者相同，只以长短来区别简或策。

但另外也有不同的解释，如贾公彦在《礼礼疏》中说：“简，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编之称。”就是说一根竹片是简，若干竹简连起来是策。孔颖达在《左传疏》中又说：“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后人多数同意这一解释，认为一片竹子叫简，若干片连起来叫策。策也可写作册，二者在古代可以通假。《说文解字》解释“册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从“册”字看，确实象编连起来的竹简。《说文解字》又说：“典，大册也。”重要的图书叫做“典籍”，现在仍这样称法。把“简”连成“策”叫编，编连所用的绳子，有的用牛皮做成叫“韦编”，有的用丝做成叫“丝编”。孔子所读的《易经》是牛皮绳连成的，

仍然断了，“韦编三绝”说明孔子读《易经》次数很多。

《南史·王僧虔传》中有“楚王冢书，青丝编。”则是用丝绳来编连的。

每片竹简有多长？古籍中有不同的记载。郑玄在《论语序》中说：“《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尺二寸，《孝经》半之，《论语》八寸。”在《左传疏》中说：“……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贵圣篇》中说：“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从出土的竹简实物来看，长短很不一致，不似有统一规定，如湖北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法律简合1尺2寸长，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元兴元年历谱》长3尺，马王堆出土的200多枚竹简更是长短不一。

每片竹简上的字数，《左传疏》中说：“简之所容一行字耳。”郑玄的《尚书疏》说：“《尚书》三十字一简。”服虔在注《左传》时说：“古文篆书，一简八字。”从出土的简策来看，多数竹简每简一行，极少数的一简两行。每简的字数，则自8字至40字不等，可见也并不求一律。简的宽度，一般为0.5厘米至1厘米。

单根的竹简编连成策，是用几道编呢？《说文解字》、《独断》二书都说是“二编”，即用两根绳来编连。从出土的实物来看，从一编到五编都有，也并不一致。

现在再说一下牍。牍是木板，也叫“桱”（qiān）。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说：“断木为桱，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秦牍。”他认为先把木块制成桱，加工成版，最

后成牍。《释名·六》中说：“槧，版之长三尺者也；槧，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如果是一尺见方的木牍，也叫“方”。

简策相当于现代一般图书，牍的用途，有时用来做记录物品的簿，户口纪录簿。写信、檄文、地图、图画面积大，只能用木牍。具体来说，2尺长的木板，用来做“檄”——即讨伐的宣言，《说文解字》中说：“檄，二尺书。”1尺5寸长的木板，用来作“传信”，1尺长的用来写信，后人把信叫“尺牍”。一些讲述如何写信的书叫《尺牍大全》。古代的信件，写在一块或几块1尺见方的木板上，在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叫“检”，在检上写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叫“署”。然后用绳子把这几块木板扎起来，打个绳结，用泥粘住绳结，以免别人打开，在这块黄泥上捺下自己的印章，这叫“封”。

简牍，尤其是简策与现代图书的作用已完全一样，是记录知识、表达思想的著作物。但在形式上差异很大，一部书要用几十、几百块竹片，十分笨重。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公文重达120多斤。春秋时期著名学者惠施博学多识，读书很多，人们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可见简策体积很大。

简牍，大约从商朝末年流行到东汉末年。到了晋代，户口簿还用木牍。《初学记》引《桓玄伪事》说：“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晋代帝王下令以纸代简，实际上简仍流行了一个时期。在《南史·张兴世传》中还有“檄版不供，由是有黄纸札。”可见全部停用还

在南北朝时期。

简牍废除以后，简牍制度对后世的图书仍在产生影响。如现在的图书单位叫“册”，就是从简牍制度形成的。图书分“卷次”，过去多数人认为始自“卷轴”，但从近年出土的简策来看，许多是成“卷”的，证明“卷”这一图书单位也始自简策，影响后世图书制度。

用板牍来纪录物品、姓名叫“簿”，也影响后世，沿用至今，仍称：登记簿、户口簿……。又如板牍写信的“封”现在也还叫“信封”。所以简牍制度创立的一些名词术语，一直为后代沿用。

图书萌芽时期的甲骨、青铜、刻石等还没有完整的图书概念。简牍制度开始写文章篇名和全书书名，先写书中第一篇文章（或章节）的名字，然后再写整部书的名字。

如：

逍遥游第一 庄子

这一制度在古代图书中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后人叫它“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到西方书籍制度传入我国才有所改变。

简牍制度中，每一种书开始有一片不写字的简，叫“赘简”，它的目的是保护带有文字内容的简，这一作法也沿续到现代，不过改称“扉页”。简策中，每一种书在最后一根竹简上往往有“尾题”，如“右治百病方”，“右破胡嬖（同燧，suì）兵物”，这一制度也影响后世千余年。

简牍制度中也有一些好的作法没有能够流传后世，如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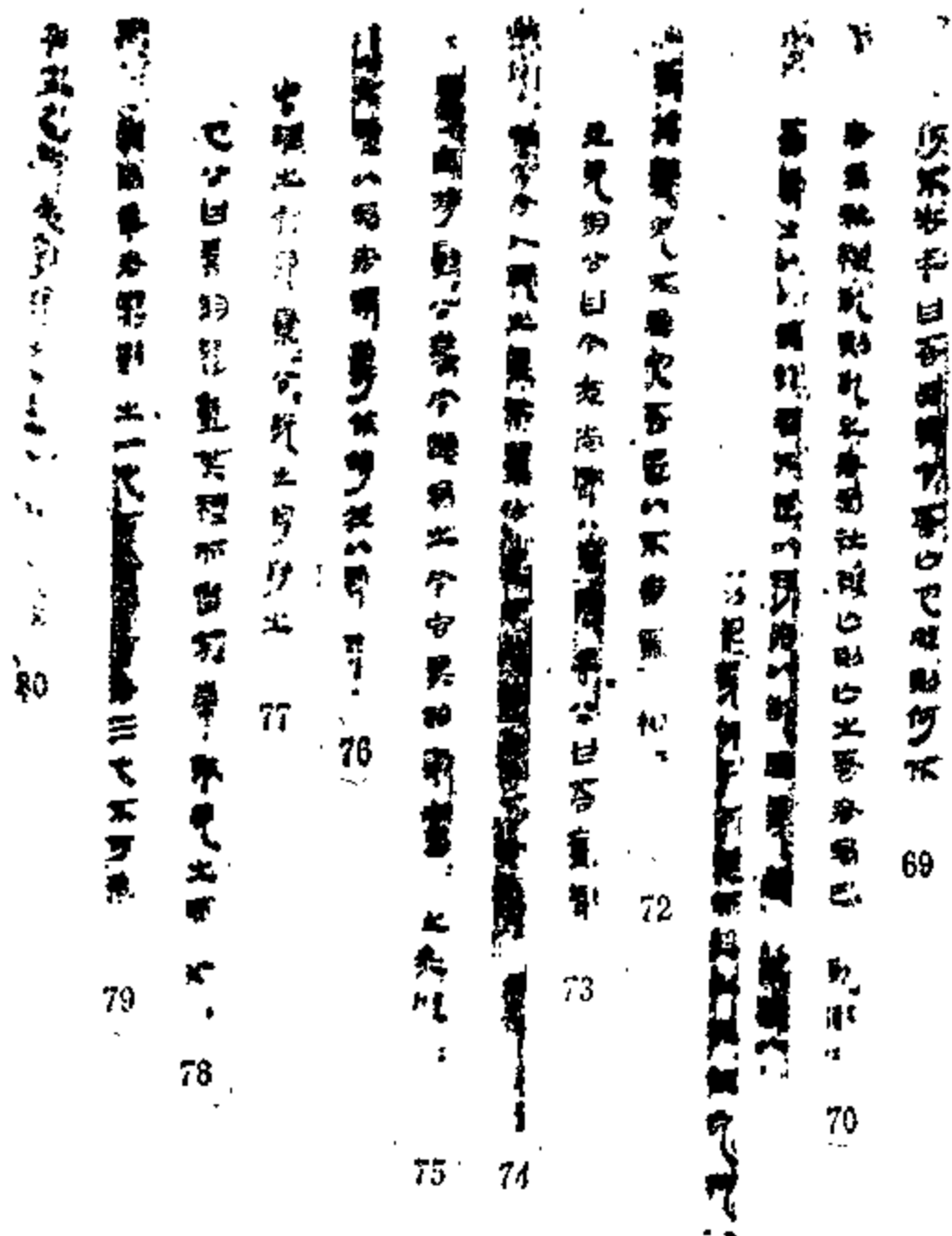
出土竹简看，有的在文章起头、句间、另行、结尾都有符号，类似现代标点符号，这一优良传统可惜没有继承，中断了千余年时间。

简牍虽然在我国流行了一千多年，但是没有任何一种传世，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近代以来出土的。这些简牍包括一些未传世的图书，也可校核一些仍流传的图书。出土的简牍，有的是记载随葬物品的，叫“遣策”，有的是公文、帐目，属档案，有的是著作物。

王红元调查说，解放前发现并见于报导的出土简牍共7起，解放后至1983年共有二十多起。这些简牍，有的解决了书中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有的补充了《汉书·艺文志》所缺。

现存的《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臆是孙武的后裔，他俩都著有一部兵法。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臆在战国中期任齐国的军师。东汉班固编《汉书·艺文志》，其中有孙武的兵书，著录为《吴孙子》，孙臆的兵书著录为《齐孙子》。汉代以后，《吴孙子》一直流传于世，称为《孙子兵法》，而《齐孙子》这本书，早在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兵法》时就不曾提到，唐代官修书目《隋书·经籍志》中也没有著录。于是后人开始怀疑，到底是有一部《孙子兵法》还是两部《孙子兵法》，有人认为《孙子兵法》为孙臆所著，甚至对是否有孙武其人也有所怀疑。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两部《孙子兵法》同时并存，各有不同，失传一千多年

的《孙臆兵法》重现人间，千年之谜，也得以澄清。（见图五）



图五：银雀山出土竹简《孙臆兵法》

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竹简达4942根，还有《六韬》、《尉

繆子》等先秦兵书，《墨子》、《晏子春秋》、《管子》等著作，有些书如《曹氏阴阳》，历代书目都没有著录过。二号墓中还发现了公元前134年的《汉元光元年历谱》的残简。其中《六韬》和《尉繚子》两部著作，有人曾认为是后人伪托的，通过出土实物确证了是先秦原著。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代的竹简，《秦律十八种》内容包括了各个方面，它不但使我们读到了秦朝法律的原文，也可认识到秦律的繁苛，并从而了解到秦代政治情况和职官制度。《编年记》是一部前所未见的编年体大事记，所记大事从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这部大事记虽然内容简单，但可以订正《史记》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为吏之道》是训戒官吏的训令。这些竹简的内容都未曾传世。

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的医方，比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早一、二百年，是最早的古代医方，已经影印出版，名为《武威汉代医简》。江陵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萧何定的法律，它失传已久，今日重现，从中可以认识汉代的法律，并了解汉初政治情况。这里出土的《秦狱书》是一部议罪案例。《盖庐》是一部兵书，用春秋时期吴王盖庐（阖闾）与申胥（伍子胥）对话形式写成。《算数书》是数学著作，早于著名的《九章算术》。《脉书》是一部医学著作，论述人体各类脉的循引和所主疾病。《引书》是一种健身操的文字解说。

大批古简的出土，丰富了我国古代文献，也为传世版本

提供了早期文字。

五、帛书的出现和卷轴制度的形成

大约在战国时期，我国开始有了“帛书”，逐渐发展形成了卷轴制度，一直延续到唐代，前后达二千年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简牍并行。卷轴所用的材料，最早是丝绸一类物品，后期是纸。

世界公认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传说公元前三千年我国已发明了养蚕织丝。从西汉开始，中国丝绸制品通过甘肃、新疆、中亚传入欧洲，这条通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事业的发达，作为图书载体的竹简和木牍太笨重，从战国时期，开始用丝绸写书，这就是“帛书”，也叫“缣”或“缣帛”。作为图书的材料，它柔软、轻便，便于携带保管，书写时易于吸墨。最初，帛与简并存，《墨子·明鬼篇》中记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两句话，意思是说写在竹子、缣帛上，或刻在铜器、石头上，这正是当时图书的四种载体。《韩非子》一书中的“先王寄理于竹帛”，可作《墨子》所记的补充。

缣帛有不同的名称和种类，清人汪士铎在《释帛》一文中说：“凡以丝曰帛，帛之别名曰素、曰文、曰采、曰缙、曰锦、曰纁。古重素，后乃尚文。”（见《汪梅村先生集》）

其中，平实无华的白帛称为“素”；它由生丝织成，不经漂染；由粗丝织成的叫“缁”，多用来绘画。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有这样一段故事：秦二世元年，陈胜起兵，许多郡县多杀长吏以响应起义。沛县令起初准备使用刘季，当刘季组织起群众以后，沛县令很后悔，于是关闭城门。在城外的刘季“乃书帛射城上”，城内父老率子兵杀了沛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这里的“书帛射城上”就是把书信写在帛上，用箭射入城内。无独有偶，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也记叙了类似的作法，“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很显然，如果用传统的木牍写信，很难缚在箭上并射入城里。

小说《三国演义》里描绘了汉献帝迁移首都的时候，士兵们把帛书用来做帐篷，这种描写是有历史根据的。《隋书·经籍志》就记有：“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的时候，官吏和群众一片混乱，秩序无法控制，汉代国家藏书遭到浩劫，对于其中的竹简、木牍被焚烧破坏，对于用丝绸缣帛做的图书，军队把大块的用来做帐篷，小块的用来做提囊。可见，东汉时期帛书数量很多。

帛书比简牍要轻便得多，但是它的价格昂贵，在民间难以使用。《汉书》中记载了汉昭帝时，钜鹿人路温舒在儿童时代为人放羊，他喜欢学习，但没有钱来买缣帛，只得用蒲草叶子编成“牒”，用来写书。

汉代以后，虽然已发明了纸，缣帛仍在使用。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记载，晋代有“治书令史”，这个官职负责领受写书的缣帛及笔墨。《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了晋代荀勗编的图书目录《中经新簿》中收录了图书29,945卷“盛以缥囊，书用细素”。可见到晋代许多书还是用缣帛的。

后魏时帛书日见减少，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所记“以丹书帛，致之枕中，以为国宝”，是帛书的特殊作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南朝宋武帝登基时，曾广求书籍，尽其所能，只得四千卷“赤轴青纸”，已是纸卷了。到了唐代只是偶而以帛写书，如《唐国史补》中记有：“素帛有织成红黑行纹者，以供书写。”

帛书是什么样子呢？先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一下。

《汉书·食货志》记载，周代的布帛，宽2尺2寸为幅，长4丈为匹。现存的其他文献也是如此记载。

缣帛柔软光滑，容易书写，可以折叠，可以卷起，比简牍要方便得多。汉代的帛书非常考究。东汉时期，有个叫襄楷的，得到一部帛书《太平清领书》共170卷，是白绢上面写上黑字，以红笔画上界行，用青绢包头——亦称护首，还用红笔标题目录。这对以后的纸书产生巨大影响，纸书有些也用红笔或墨笔作“界行”，就是沿袭了帛书的传统。

记载汉代图书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时有的称篇，有的称卷，一般认为当时的图书是简策的称篇，是帛书的称卷。有人认为简便宜而帛贵，贵重的书往往用帛书，而有些书草稿本用简，定稿本则用帛。应劭在《风俗

通》一书中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从《汉书·艺文志》看，儒家经典皆为帛书，天文、历法、医药、十筮等方面著作也为帛书，其它则是简牍。另外，绘图则是帛书的优势，因它面积可大可小，如古代兵书正文是竹简，附图则是缣帛。

从出土的帛书实物来看，图多，文字很少。1908年在敦煌发现了两件写在缣帛上的信件，据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信件。1934年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一件帛书，统称之为“楚缣书”，上面有图，也有文字，字体与战国简书相近，共有750多字的主文以及图画的标题、说明等200多字。

1973年冬和1974年春，在长沙的马王堆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3幅是军事地图，据考证这是汉文帝以前的作品，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地图。同时还出土了十几种古代著作，共计二十多万字，均是帛书。这是“帛书”空前的一次大发现，对中国有关帛书的研究以及古代书史增加了实际内容，丰富了古代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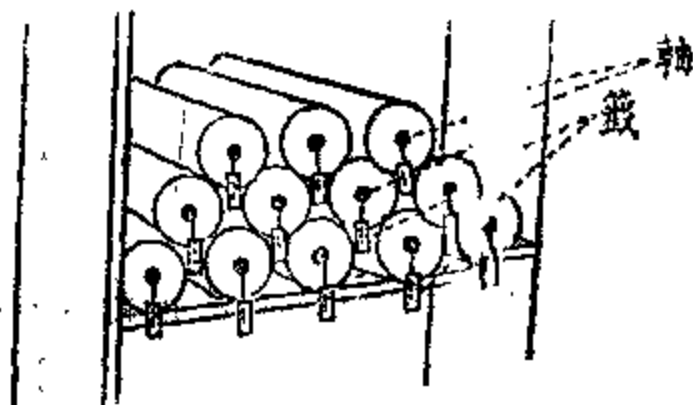
这批帛书经过考古学家们的考证，确认是公元前2世纪或再早一些的图书。从内容上来看，有的书已失传了一、二千年之久，是属于古佚书，有的如司马迁、刘向、班固这些汉代人也未曾读过，如今却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十几种书的内容包括了哲学、阴阳、天文、历书、五行、杂占等。其中有的现在有传世之本，但与出土的帛书校核，内容均有不同，可见一些古籍在二千多年的传写或梓刻当中出现了不少

讹误增益。如著名的《老子》一书，这次同时出土了两种不同的手写帛书，我们暂把它叫做甲本、乙本，但两种本子的内容顺序都和我们今天见到的本子不同，它们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甲本卷后与乙本卷前都有4篇近3万字的佚文。甲本比今本多的这一部分是研究五行学说，乙本多的一部分是讲黄老思想的。这批帛书中的《战国策》有一万二千多字，与今本也有较大不同，大部分内容在今本里都没有。这批帛书中还有的是没有传本的佚书，如《战国纵横家书》28篇，一万一千多字，记载了战国时期苏秦、苏代等人的言行，存世的《战国策》、《史记》等书均未有记载。《五星占》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是秦汉时期人们对行星运动现象的记录。这批帛书为中国学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形式上来看，这批帛书是用墨笔篆字或者隶书字写成的，因为汉代已经通行隶书了。帛书的高度，从实物来看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24厘米与48厘米两种，也有的是23或18厘米的。在题记方式上，一般在卷末注明了字数，分篇的提行则与简策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简、帛并行，互相影响。

纸发明之初，缣帛还使用了一个时期，南北朝以后全部由纸代替。缣帛很柔软，开始用折叠以保存，以后则卷成卷，并在中间加轴，称为“卷轴”。纸发明之初，每张纸的尺寸不大，用来写书，也做缣帛，几张或十几张粘连起来卷成一卷，中加以轴。这就形成了图书制度上第二个时期——“卷轴制度”时期。

卷轴制度的特点之一是每书中间有一根木棍或其它材料的棍做轴，缣帛或纸绕轴卷起来。明人都穆写的《听雨纪谈》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邴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这是根据韩愈的一首诗：“邴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邴侯是李邕，为唐代著名藏书家。这首诗是卷轴制度的写照。（见图六）



图六：卷轴（在书架上）

用作卷轴图书的“轴”，原料和颜色在发展中逐渐有所不同。轴的原料有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金紫檀、旃檀……，颜色则有红、绀、白、绿等。《隋书·经籍志》中记有：“炀帝即位，秘图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还有的是以不同的轴代表图书不同的类，如《玉海》一书中记载：“唐开元时，两京各聚书四部，列经、史、子、集，四库皆以益州麻纸写，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经库，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铜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

笠。”

用帛为卷轴，根据书的字数多少，裁剪帛的大小，用纸为卷轴则用若干张粘连而成。卷轴的高度一般25至30公分，长度则相差很大，一般3—5市尺（50到70公分），甚至有长达一、二丈的。

卷轴制度的图书，每一行书写17个字到24个字。每一幅纸上，还用墨或铅划上行，唐人叫做“边准”，宋人则叫做“解行”，也叫“栏”，按其颜色，黑色叫“乌丝栏”，红色叫“朱丝栏”，上下四周叫“边栏”，每一卷大约写20—3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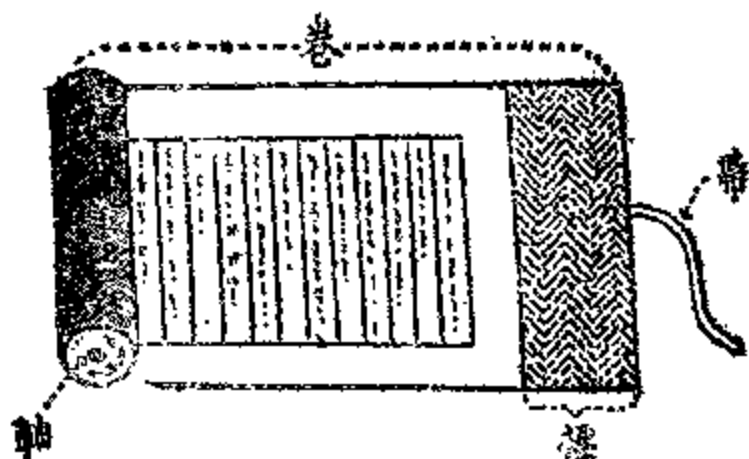
卷轴时期，在文字上已经开始区别正文和注文，这是从经书的注释开始的。正文和注文，有的正文大字，注文小字双行；有的是正文与注文用不同颜色。

每卷书开始时，在卷首空两行的位置，然后先写本篇的篇名和卷次，再写全书的书名，这与简牍制度是一致的。

以轴为中心卷起帛或纸，为了保护图书内容，在卷子最外面加上一段不写字的罗、绢、锦等丝织品，叫“褭”，头上再系上一根带子以做捆结之用，叫“带”。这样，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卷轴。（见图七）

卷轴制度继承和发展了简牍制度的一些作法，又影响了以后的册叶制度：

一、简牍有“褭简”以保护图书，而卷轴有“褭”起同样作用，以后的册叶制度则采取“扉页”，先后是一脉相承的。



图七：卷子

二、每一卷先写篇章名，再写全书名，这种“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作法始自简牍，卷轴、册叶制度也延袭使用，流行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三、文字之间有界行的作法始自卷轴，在以后的册叶制度中，仍然为许多书所采用。

四、简牍时期的图书单位，一般为“篇”，“册”，卷轴时期为“卷”，这些不同的称呼，后世都在使用，一直到今天。

五、正文大字，注解双行的作法也影响深远，至今仍有这样做的。

六、正文与注文用两重颜色书写，导致了套印技术的发明。

七、用不同颜色的轴表示不同的类，用书签标书名的作法，对近代以来图书馆工作中的贴书标以及采用颜色书标起了启发作用。

六、造纸术的发明和 初期的纸书

造纸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的成功，大大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我国什么时候发明了造纸术呢？有些人认为是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因为《后汉书·蔡伦传》中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所以有人把汉元兴元年作为造纸术的发明时间。

但是，也有人指出，蔡伦以前我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从文献上看，在《汉书·外戚赵孝成皇后传》中有这样一句话：“篋中有裹药二枚赫蹏（tí）。”应劭在注释“赫蹏”一词时说是“薄小纸也。”从而认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已经有纸，这比蔡伦早115余年。《后汉书》另一条记载说，公元76年汉章帝命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这也比蔡伦早。还有一种说法，东汉蔡邕在《独断》一书中说：“左伯，字子邑，能造纸。时蔡伦亦为之，伯尤精妙。”《北堂书钞》中在“左

伯纸”这一条中引用《三辅决录》说：“韦诞奏用张芝笔，左伯纸及巨墨……”都认为是左伯发明的纸。

对以上的文献记载又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蔡伦以前虽然已经有了“纸”，但是这些所谓的“纸”是丝纤维做成的，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丝绸，而不是后世通用的以植物纤维做成的纸。东汉的《说文解字》对“纸”的解释是“纸，絮一箔（qín）也。从系氏声。”什么是“箔”？又解释为“激（pì）絮，簣（zé）也。”“激”是水中击絮也”，“絮”是“敝棉也”。段玉裁在注释《说文解字》时解释为“按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箔荐而成之。”所以早期的造纸术是将恶茧、茧衣等丝织业中的次料、废料煮后漂洗，然后放在竹席上于水面打击成薄片。这种“絮纸”仍然价格昂贵，不能算是真正的纸。至于《后汉书》中关于汉章帝给贾逵“简、纸经传各一通”的记载，有人也认为这里的所谓“纸”，就是丝纤维的纸。

文献上的记载，各所不同，因而引起争论不休，难以统一。实物如何呢？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又有新的论断。1933年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记载了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出土的一片古纸，经鉴定为原料是麻质，颜色白色，形状为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地粗糙，不匀净，在纸面上还存有麻筋。这一片纸，约4×10厘米，被认为是刚发明造纸术后不久的产品。在这里同时出土的还有汉黄龙元年（前49）的竹简，从而认为这是西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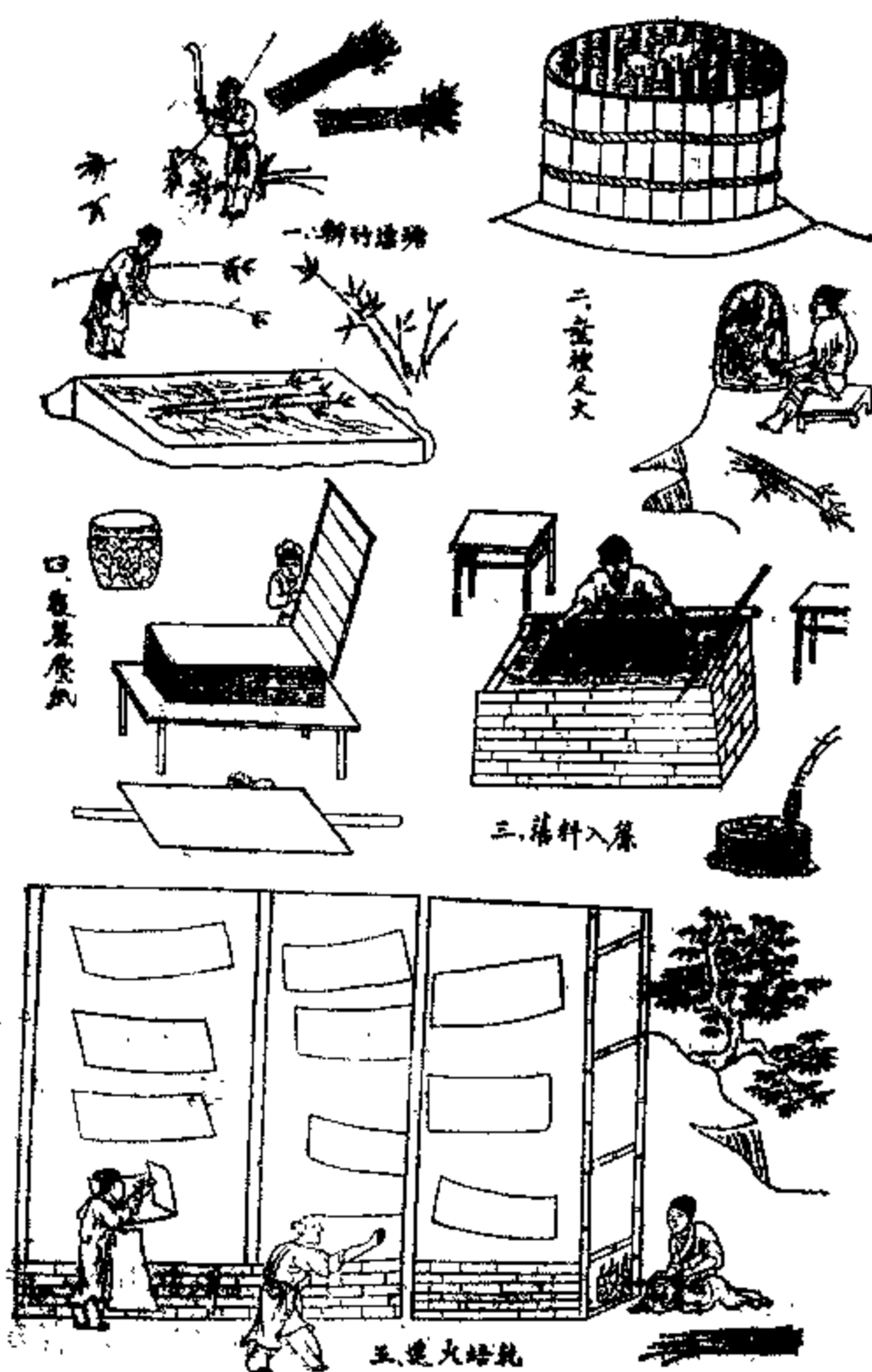
生产的纸。

1957年5月，在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出土了一批铜器、陶器……，其中包裹一面铜镜的是一张纸。它是米黄色，长宽均为10厘米，有麻布压的布纹。有人认为这是丝纤维的纸，但是潘吉星同志于1965年将这片纸进行了科学试验，把纸样切成片，作了纵剖面、横剖面的高倍显微分析，又和植物学家们共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确认灞桥纸主要成分是大麻纤维所造，又间有少量的苧麻。大麻是我国最古老的麻类作物，《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二句，这里即指大麻。

197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金关出土了两片纸，时间确定为西汉时期。经过分析、化验，再次证明是植物纤维造的纸。这些成果，潘吉星写入了《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一书，于197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许多人同意潘吉星的论断，蔡伦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并且原料已是植物纤维。

虽然，蔡伦之前已发明了造纸术，蔡伦本人仍起了总结提高的重要作用。《东观汉记》中说：“黄门蔡伦，典作尚方造纸，即所谓蔡侯纸也。”意思是说，蔡伦“典”（即“主管”）造纸，他负责皇帝宫内的供应包括纸在内。所以在蔡伦主持下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并进行了改进，继续寻求不同的植物纤维，大批生产廉价的纸，这一功绩仍是很大的。（见图八）

我国图书的载体，千余年中做了若干试验，以简来说，



图八：我国古代造纸术示意图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人东方朔“公车上书，凡用三个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今日看来令人发笑。而帛呢？在汉代一匹帛值六百余钱，相当于6石米的价格，昂贵得令人吃惊。纸的发明，给图书事业带来了价廉物美的材料，大大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早期的纸，还较粗糙，少用来写书，另外，有钱人认为帛书高贵，愿用帛书。《北堂书钞》记载，东汉人崔瑗（字子玉）送给他的朋友葛龚纸抄的《许子》，崔瑗同时附有一信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表明帛书珍贵，纸书寒酸。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为拉拢吴国，把自己所著的《典论》和诗赋送给吴主孙权一部缣帛本，而送给张昭的则是纸写本，可见帛、纸有贵贱之分。

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纸的质量不断提高，到了晋代已普遍愿用纸书了。晋人傅咸还专门写了《纸赋》，其中说：“夫其为物，厥美可珍。禀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晋人左思创作的《三都赋》，“构思十年”，文采斐然，“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成语“洛阳纸贵”的来源，也说明富贵人家也用纸写书了。

到了东晋末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到了这时，官方的简牍文书全部以纸代替，全面进入了纸书时代。今天，虽然有了声、像读物，纸书仍占统治地位。

从甲骨、简牍、帛书到纸书，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主要是写本书。书写材料为纸、墨、笔、砚，即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古代写书用的纸多用黄檗（bò）汁染过，文献上叫“黄纸”，这样可以防虫蛀，也可以延长书的寿命。国外科学家认为中国唐、宋图书历久不坏，经检验中国纸书用纸含“酸”很少。

写书的笔，一般认为是蒙恬发明的。崔豹在《古今注》中说：“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羊毫为被。”其实蒙恬以前已有毛笔，《战国策》已有“取笔腴受言”的记载。1954年并出土了战国时的毛笔实物。

“墨”的发明，时间当与毛笔一致，《孟子》中已有“大匠不为拙工改绳墨”。曹植的《长歌行》中有“墨为青松之烟”，这时已用松木烟制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制墨技术的详细记载。

汉代已有砚台，刘熙的《释名》一书中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通过纸、墨、笔、砚的综合运用，我国进入了一个图书的写本时期。

纸书出现以后，图书事业发展速度加快，拥有图书的人，已从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专有走向社会广大群众。出现了卖书和买书，图书开始成了商品。《后汉书·王充传》中已有洛阳书肆的记载，这时已经有了书店。除国家、寺院等进行藏书以外，还有了一些私人藏书家，如唐代的邺侯李泌（mì），作为藏书家，已达三万卷之多。

私人藏书的发展和图书商品化，反过来又刺激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西晋时期荀勗整理国家藏书计有29945卷，虽然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几经战乱，图书受到了许多损失，到了隋代，国家藏书反而增加到89660卷之多，说明了图书的品种日益增多，这与造纸用于图书是分不开的。

初期的纸书——主要指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时期，从内容上看比汉以前大大丰富了。向、歆父子编的书目《七略》，还没将历史作为一大类，可见汉以前史书很少。到了晋代，从《晋中经簿》这一目录开始，已将历史书籍作为大类，这以后史书日多，继《史记》之后，产生了《汉书》，《三国志》、《东观汉记》等著作。个人著作，虽始自春秋，称诸子百家，东汉开始广泛将个人著作结集出版，称为“别集”。晋之挚虞，将诸家之作，汇为一集，编成《文章流别志》，是总集之始，继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了《文选》，这是著名选集。文学评论这一体裁，也开始于这一时期，最早的有陆机的《文赋》，后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梁代钟嵘的《诗品》是最早的诗歌理论和评论。

汉代有了我国第一部字书——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第一部词典《尔雅》，它们的出现和流传都与纸的用在图书上相关。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类书，这种大型图书，如果没有纸，用简牍那将数量太多，不可想像。图书品种多了，又产生了专门记载图书的目录，如从国家编的《七略》、《晋中经簿》到私人编的《七志》

《南朝齐人王俭编》和《七录》（南朝梁人阮孝绪编）。

早期的纸书，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并不多，因为“纸”这种图书载体，有它的缺点，不易保存太久，既怕火烘，也怕水湿。1900年，斯文赫定在新疆楼兰发现了一批纸质文件，大多数没有写明是什么时间，少数标明是在公元252至310年间。这些写在纸上的文件，有公文、信函，只有一种是图书，即《战国策》的残卷，以隶体书写，没有确切时间，被认为是公元3世纪的图书。

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8年至1930年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些古纸和图书，大多是晋唐时期的。其中一部佛经，有标明的日期是公元436年的。被认为最早的纸写本书是在新疆发现的《三国志》。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佛经，还有《三国志》中的《孙权传》，这是残卷，尚存40行，共500多字，字体为隶书，据认为是东晋时的写本。无独有偶，在新疆鄯善也发现一部《三国志》的残卷，是《吴志》，存80行，共1000多字。

1969年，也是在新疆，在一座唐代墓葬中发现了写本纸书《论语郑氏注》残卷，残存520厘米，内容包括《学而》、《为政》、《八佾（yì）》、《里仁》、《公冶长》等五篇。《论语郑氏注》是从唐代已散佚的著作，又得再现人世间。这部书，在《公冶长》之后题：“景龙四年二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写”，因而明确了是唐中宗景龙四年（710）的图书。新疆还发现过隋代写本《典言》。蒙古族的侯国柱于1948年在印度收购了一部我国的卷轴形式佛经，共用了34张

细质染成黄色的纸粘连成的长卷子，字体为楷书，书写十分工整圆润，内容为《羯摩经》的佛典戒律。1984年侯国柱把它捐献给了国家。经专家鉴定，这是我国隋唐时期的卷轴写本纸书。

新疆发现的《三国志》经化验，所用的纸很薄，色白，质地优良，确认为麻类纤维所造，说明了东晋时造纸术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七、稀世珍品——敦煌卷子

我国初期的纸书长期失传以后，最早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也就是发现殷墟甲骨的同一年，在甘肃省敦煌的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代图书，都是卷轴形式（后称“敦煌卷子”），所用材料，有的是缣帛，但大部分是纸书。这批卷子以及石窟内的其它文物、壁画，给历史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极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历史资料，不久形成了“敦煌学”，使古代文化、历史、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敦煌卷子成为古代图书中的珍品，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是汉武帝时期（前111）建制的河西四郡之一，为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总络东西的交通要道，在中西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据莫高窟唐圣历元年（691年）碑

文的记载，佛教徒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始在这里开凿石窟，雕凿绘画。以后经过南北朝、隋唐以至元代，千年间的不断修建，使一座1600米长的崖壁上形成了重重叠叠，栉比相联，规模宏伟的石窟群。

大约在西夏时期，因为连年战乱，当地的和尚们把大批佛经、各类图书、文书档案等秘密封存在石窟里。天长日久，这些图书被人遗忘了。1899年，一个叫雷圆篆的道士在修洞时偶而发现了这些珍藏，开始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重视。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许多珍贵文物图书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英国人斯坦因取去7000卷左右，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盗走了3000余卷，被认为是敦煌文物中的精华，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日本公私所藏也达2000余卷。据日人藤枝晃调查，在苏联藏有10000多卷，为数最多，现存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德国、美国也有一些。

清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学部才下令“行陕甘总督，请飭查检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把劫余的8679卷运到了北京，初藏于学部图书馆，192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解放以后，又多方搜集，又得100件以上。另外，中央民族学院，台北等地也藏有敦煌卷子一万几千件。目前，国内外收藏的敦煌卷子共达50000卷（件）以上，其中有的是残卷。

清雍正时，汪灏的《游千佛洞》诗，曾以“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来称赞敦

煌壁画艺术；嘉庆间学者徐松详录敦煌碑文，辑入所著《西域水道记》。藏经洞被发现以后，我国学者当中，是金石家叶昌炽首先发现其藏书的价值，他著的《语石》一书，对敦煌遗书作了阐述。1909、1913和1917年伯希和送给蒋斧、罗振玉一些敦煌卷子的照片，罗振玉印为《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编，在中国学者中揭开了敦煌卷子的帷幕，王国维、刘师培、曹元忠、缪荃孙等人借以进行了研究，从此研究敦煌之风很盛，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发表了论著。1925年刘半农从巴黎抄回一部分语言文学图书，促进了我国对唐代俗文学和韵书的研究。1934年后王重民、向觉明到巴黎、伦敦拍摄了更多照片。30—40年代不少学者投身于敦煌卷子的研究。解放后，续有发展。敦煌卷子的研究成果，结集者已有《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初探》、《敦煌变文集》、《敦煌资料》、《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并有《敦煌研究》丛刊。

敦煌遗书，少量为印本，大部为写本。这些卷子从公元5—6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主要是唐代的图书，内容除佛经外还包括道经、儒家经典、文字学、历史、地志、医书、小说、通俗词典，唐代俗讲、诗、词、小曲及信札、帐簿、日历、户籍、契据等。就其文种来说有汉文、西夏文、藏文、梵文、波斯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唐代前后的大批图书能以保存至今是多么可贵。

敦煌卷子当中，经部有《易》、《诗》、《书》、《仪礼》、《左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

雅》等。如唐写本《尚书》是古定本，据此可证明宋代版本之伪。如王重民以敦煌卷子《周易王弼注》与《周易释文》，开成石经《周易》拓片以及宋以后版本相校，有的与《释文》本一致，有的与孔颖达的《正义》一致，有的与各本均不一致。敦煌卷子中的《毛诗故训传》残卷五，唐写本二，六朝写本三，与宋元刻本相校异同很多。

史部著作中，如《史记集解》、《贞元十道录》等都可与宋以后传世之本进行校勘。《西州图经》、《寿昌县地境》等书均无传本。以《西州图经》与新、旧《唐书·地理志》相校，多数相合，但亦有不同，如《唐书》均言西州领县五，新志有煎庭，旧志有高昌，为一县二名，但《西州图经》二县并载，领县实为六。此书为唐初所作，当证《唐书》之误。

子部中包括一些科技著作，如陶弘景的《本草集注序录》、苏敬的《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道家著作中不少是久佚之本，包括《道德真经疏》、《老子化胡经》等。宋代陈氏《直斋书录解題》说：“《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译条次修纂。”但《修文殿便览》于宋末已佚，在敦煌石窟中存有此书之残卷。它如《李氏蒙求》等书亦为佚本。

集部中包括许多诗、词以及变文、话本、俗赋等文学作品。如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千百年来未能流传，敦煌却有9种本子。又如《玉台新咏》与传本相校，多有讹异，如《杂诗》“容与缘池阿”一句中，今本“缘”字误为

“绿”字等甚多。潘岳诗之前，敦煌卷子先题“潘岳诗四首”，下小字夹注“内顾二首，悼亡二首”，然后分别列出题目。现在的传本只写潘岳“内顾诗”二首，而总篇数削去，可见后代人的删改。而大量“变文”、“俗讲”及小说、小曲之类当时的民间文学作品，失传已久，通过敦煌卷子得以重见，并使我们知道了唐代前后人民大众的文学喜爱。

敦煌遗书大部分是纸书，纸卷长短不等，长的2—3丈，短的仅2—3尺，长卷由十几或几十幅纸粘接而成，短卷只有2幅纸。少数为绢帛。装帧上主要是卷轴，也有的书有两种装帧，如《李氏蒙求》一书，甲卷为卷子本，乙卷为经折装。这些书大部分是写本，还有拓片，也有一部分印刷本，如世界上现存的最早印本书籍《金刚经》也是在敦煌发现的。

敦煌处在沙漠地区边缘，气候干燥，洞窟又密封得很好，这使得众多的纸书得以长久保存。唐代以后，敦煌地区人烟稀少，罕有人至，免受兵火之灾，这使得东晋到五代这一历史时期写成的大量图书，得以保存至今天，成为图书史上的瑰宝。

敦煌卷子的作用有三：

一、使我们知道唐代前后图书实物的形态。如卷轴制度在唐代是什么样子，当时图书的纸、墨、字体、格式的具体情况。

二、一批失传已久的图书得以保存，可以重新发挥作

用，尤其是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史。

三、有些图书虽有版本流传，但讹误不少，与敦煌卷子相校可以辨别真伪。

由于大批卷子保存在国外，对它的研究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深入。

八、古籍装帧的发展—— 从简牍到线装

中国古代图书的外部特征——装帧，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最早的图书简牍中，除了木牍是散页以外，竹简都是将若干竹简编连在一起，由于竹简窄细，竹简多的——也就是字数多的图书再卷在一起，如同卷竹帘一样。缣帛以至纸的卷轴也相类似。

汉代以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开始有一些文字众多的著作问世，如史学中司马迁的《史记》，收编各家著作的总集。蔡邕编的《文章流别志》等。尤其是写出了一批工具书，如字典《说文解字》、词典《尔雅》、类书《皇览》、《初学记》等等。对于这些工具书，大部分读者不是从头至尾的阅读，而只是查阅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卷轴的形式就更不适应了。唐代开始，将整卷的书，改为每隔一段折叠一下，最初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多数是佛经，所以叫“经折装”，它可能受印度佛经中“贝叶装”的影响。斯坦因盗走

的敦煌遗书中，已有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对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此小册经即为是式，共凡八页，只印一面，然后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年代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949年。”（见蒋元卿：《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这种“经折装”后人多混为“梵夹装”。据李致忠《中国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考证，“古代中国人关于梵夹的称谓，是专指从印度传进来的、未经翻译的、书写在贝叶上、而又用两板相据夹的梵文佛教经夹而言的，它与‘浮图揭汉，梵夹翻华’之后的汉文佛经，书写在纸张上，装成卷轴，而后由卷轴加以折叠而形成的所谓经折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却有本质上的区别。”（见《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这种经折装有一个缺点，取书或读书时容易散，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叫“旋风装”。《墨庄漫录》载：“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对“旋风装”的解释有所不同，有人认为仅是把经折形式的第一页与最后一页粘连起来。新版《辞海》则说：“‘龙鳞装’也称‘旋风装’，图书装订名称。原用纸质较厚的叶子，两面书写，四周不留空余。用紫纸裱成手卷，由左向右，逐页缩短，形如鳞次，卷时则由右向左，外表是手卷形式。”故宫博物院藏有的唐代吴彩鸾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宋代的装订，对这部书，元代王恽在《玉堂嘉话》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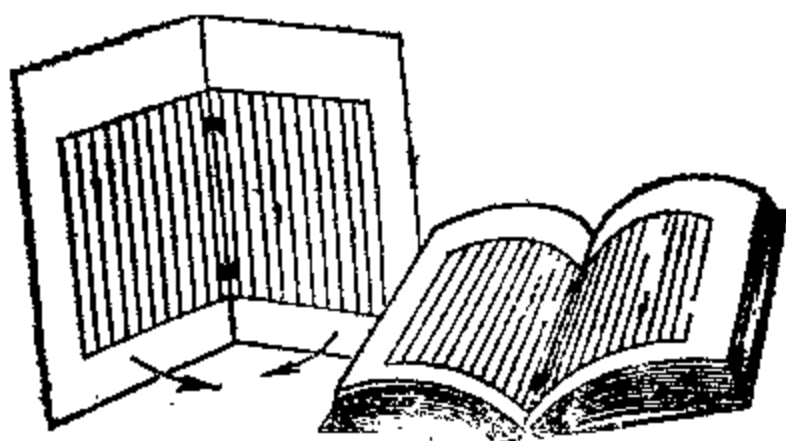
“吴彩鸾龙鳞楷韵”。另外，也有人认为旋风装与龙鳞装是两种装订形式。

经折装、旋风装是图书装订从卷轴装向册叶装过渡的一种形式。宋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各类著作也大量产生，使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发展为一个高潮时期。在图书装订形式上，从卷子发展到叶子。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后有叶子，因卷轴难于舒展，故以叶子写之。”从这些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图书的装订从卷轴开始的每卷为一个单位，到唐朝末年开始形成的一叶为一个印刷或书写单位。即进入了册叶阶段。

最早的册叶形式叫“蝴蝶装”。《明史·艺文志》中记有：“文渊阁藏书，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书皆倒折，四周向外，此即蝴蝶装也。”

什么是“蝴蝶装”呢？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解释：“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从版心内向，单口外向，揭之若蝴蝶翼。”其特点是版心朝内，它的优点是除书背之处不易损伤以外，其它三面，如有损伤霉湿，都可随意裁去。蝴蝶装，以硬纸作封面，可竖立排架。排架时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名也写在书根上。北京图书馆藏的宋装《欧阳文忠公集》、《册府元龟》就是这种形式。（见图九）

蝴蝶装有它的缺点，即阅读不便，读一页文字，便有一页空白，于是，人们又进行了改革。南宋后期出现了“包背装”。它已把书口做为中缝，后背用书衣粘连在一起，与现



图九：璇蝶装

代图书基本一致。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就采用的包背装。

采用包背装不久，就已感到用胶粘连册叶十分费事，开始有人用纸做出纸捻把叶子订起来，明代中期以线代纸捻，这就是“线装”。《藏书纪要》中说：“订书用清永白绢线双根订结，要订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经折装，旋风装始自佛经，所以千余年来佛经、道经一直延用，到了现代有些法帖、画册还用这种装订形式。包背装也偶有用之，线装书自明代至清末流行了500余年，现代有的书籍还用这种装订形式，并且“线装书”成了古籍的一个“代名词”。

从卷轴开始，每部书外加“帙”以做保护之用。《说文解字》释“帙”时为“裘(zhì)，书衣也。”《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魏荀勗总括群籍，分为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缥囊。”即指帙。帙的原料不同，晋代的《中兴书》说：“有青缣帙、布帙、绢帙”。罗淑言《鸣

《沙山石室秘录》中记载了敦煌卷子有以细织竹簾为帙者。

卷轴改为册叶以后，帙进而为“函”。大部分图书外面有函，不但一种书二册以上者有函，有的书只有一册也有函。函，具体分析起来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把硬的纸随书的大小裁制，外面包上布或绢，把书包起来，只露书的两端。这一类函，也叫“书套”或“函套”。二、用木，按书之大小做成木匣，一面可以启闭，图书在匣内可以保护无损。三、夹板，也是用木片按书的大小制做，上下各一片，两侧用布条连接。四、纸盒，与布函、木盒相类似。

现代图书中的“精装”，以硬纸或塑料制品来做封面、封底，也是在古籍函、夹板等影响下发展而成的。

九、图书的特殊类型——拓片

我国古代图书发展上，“拓片”是一种历史久远、经久不衰的图书类型，各图书馆大多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拓片。北京图书馆1988年从馆藏拓片中选出了两万多种出版，其中秦汉200多种，三国迄南北朝1200多种，隋唐迄五代十国5200多种，许多内容是一般图书所没有的。

拓片大部分是石刻所拓，上面已经谈到，至迟到周代已在石上刻字，汉代熹平年间又在石上刻儒家经典，叫做“石经”。天下读书人，有的亲去抄校经书，有的靠拓片来校核。拓印技术也称捶拓，它属于一种文献复制技术，即将刻

在石头上的文献或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献复制在纸上，形成新的图书。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它是唯一的复制方法；印刷术发明之后，现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前，保存石、铜文献原样也只有用这种方法，它不会因传抄而出现讹误。

为了有一种正确的儒家经典标准本，继汉代以后，三国时，魏正始间（240—248）第二次刻了石经。正始石经分刻于36块石碑，每碑高192公分，宽96公分，每碑字数约4000，共有14万7千余字。正始石经只有三经，即《古文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它由嵇康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同时写成，也叫“三体石经”，也可做为三种字体的对照字典来看，现有拓片存在。

唐代开成年间（836—840），虽然这时纸书已很流行，但抄写错误仍未解决，且汉魏石经均已不存，于是又由郑覃用正楷写了儒家经典上石刻凿，这时候，儒经已增至13种，即《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上石刻成以后立于长安太学，后人称为“开成石经”，现仍完整地存于西安的碑林。

五代时，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学宫又刻石经9种，后人称为“后蜀石经”。

宋代以来，印刷术已很流行，但又刻了三次石经。北宋仁宗刻了九经，立在汴京的国子监，后称“北宋国子监石经”，在战乱中已不存。南宋高宗用楷书手写了《诗经》、《书经》、《周易》、《春秋》和《礼记》的一部分，上石

立碑，立在临安，后人称“南宋高宗御书石经”，现仅存残石和拓片。清朝乾隆间（1736—1795），由蒋衡用楷书手写十三经上石，共10多万字，立于北京国子监，后称“清乾隆石经”，现仍存。以上这些石经，有的全存，有的存拓片，有的仅存残石或其拓片。它们都成为校勘后世印本古籍的重要依据。

我国古代刻经于石不仅有儒家经典，也有释、道两家的经典。佛教刻立石经是希望佛经能永久保存，留传后人。北齐唐邕说：“缣帛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永，皮纸易灭。”

（见阮元：《山左金石志》）说明了他们认为缣帛、简策、金牒、纸书这四种图书材料都容易毁坏，唯有刻石能保存永久。

最早的佛经刻石可能是公元551年在山西太原风峪山的石窟内刻的《华严经》，据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记载，凡126块石碑，每碑23行，行57字。

山东境内有许多刻于公元六世纪的佛教经典，如泰山石刻《金刚经》为隶书体，现存有296字，被尊为“榜书之祖”。徂徕山刻有《大般若经》、《般若波罗蜜经》的片段。最伟大的佛经刻石是在河北省房山的石经山。房山是佛教圣地之一，从北齐开始在山上刻有佛经，从公元605年到1091年先后刻了105种经典，包括《大涅槃经》、《妙法莲花经》、《陀罗尼经》等，全文达120万字，形成一部庞大的佛经丛书。

道教也同佛教一样，将自己的经典刻石传世。自唐代以

来，至少有8处将《道德经》刻石，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708年，刻于河北易州。

我国石刻的图书，除儒、释、道三家经典著作之外，内容还很广泛，如古代普遍流行在墓前立碑，上有墓志铭，相当于人物传记，而更多的是题词和诗、词。石刻的诗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出版的诗，词又勒石于山崖，这只起到书法艺术的作用，第二种是作者写诗、填词以后并没有出版，而只是刻石以存，这就起了一般图书的作用。

刻石当中，还有一些不多见的图书，如洛阳龙门，有一处石窟，石壁上所刻的全是中医的“药方”，即中医验方，这些刻石相当于一部方剂图书，使一些古代方剂得以长久存世。

石刻图书，不仅其本身可以流传久远，并且又通过拓片广泛流传。拓片及其拓印技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图书类型，又与印章一起被认为是启发发明印刷术的两个因素。

在青铜器发明之后，我国已经用铜刻制印章，以后作为印章的材料很广泛，包括木、石、牛角、象牙等等。刻制印章是把字凸或凹在材料上，然后把纸铺在下面，在印章上用印泥印在纸上。印章最初是刻上人的姓名或单位，以后发展到一句话，一句诗词，甚至一篇文章，这给人发明印刷术以启发。

拓印是将一张薄的纸用水浸湿，放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把纸刷匀与石贴平，再轻轻捶打，由于刻石的文字是凹进去的，带有文字笔画部分的纸便嵌了进去，等到纸大体已

干，以布包棉花做成拓包（也叫模子），蘸上墨汁，在纸面上轻轻捶拓。石面部分染上了黑墨，字的笔划部分因凹了进去形成空白，沾不上墨。墨干之后揭下纸，就形成了一张黑纸白字的文献。这种方法不但可用于拓石刻，也可以用于甲骨、铜器、陶器等各类刻制的载体，而应用最广泛的是拓印刻石。

拓印的技术始自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它一定是在造纸术发明之后，并且要能造出质地较薄的纸，一般认为在晋代以后。现在存世的拓片最早的是公元六世纪的产物，但在此之前已经运用了捶拓术。《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的皇家图书馆中藏有拓印的图书，以“卷”为单位，它包括了秦始皇东巡会稽时的石刻1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曹魏正始石经17卷，都是刻石，主要是石经的拓片。并且还记载了梁代所藏的石刻文字，到隋朝已经散失。一般推论，拓印技术广泛使用当在南北朝时期。

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如公元718年，集贤殿书院就有搨书手6人。

现存最早的拓片，一般认为是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手写刻石的《温泉铭》，是公元654年所拓。敦煌石窟内还有公元9世纪的拓本《金刚经》，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等。拓印技术，源远流长，千余年来一直是一种文献复制技术。拓片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学习书法者大多

从拓印的碑帖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到今天，拓印技术仍在被继承、应用。

许多人认为拓印技术与印章一样，是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之一，至少它启发了人们对发明印刷术的思考。拓印，板印都是利用一块板、涂上墨来复制文献的方法。从“板”的材料上来看，拓印的材料主要是“石”，但也有“青铜”或“陶器”；印刷术则主要是“木板”。两者印刷方式上的不同点，拓印的字是凹进去的，所以印出来是黑纸白字；雕印的字是凸出来的，所以印出来是白纸黑字。拓印，墨是刷在纸上的，所以刷一次墨印一张；雕印，墨是刷在字上的，可以刷一次墨印若干张。雕印比拓印进了一大步，无论如何，直接也好，间接也好，它在发明创造中受到拓印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拓印产生的大量拓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也是我国独有的图书类型。

十、印刷术的发明

从甲骨到纸的发明，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纸的发明使图书的发展有了一个飞跃，但写本书仍然限制了图书的数量，使图书的发展仍受到很大约束，知识的传播、学术思想的交流，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受到影响。

印刷术的发明，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加快了信息的传递，扩大了掌握知识的领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展。使我们感到光荣的是印刷术同造纸术一样，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同列为四大发明之一，又都与图书发展息息相关。

印刷术中，首先发明的是雕板印刷术，那么，具体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说法。最早者，认为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发明了印刷术；最迟者则认为到了五代才有印刷术，前后相差竟达700年之久。现在，介绍几种主要的说法如下：

一、汉代说

清代郑机（字春园）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杂考上·人事”里说：“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板不始于五代。”意思是说，后汉人张俭因反对宦官侯览，而遭到“刊章讨捕”“刊章”二字，有人解释为刻板印刷的文件。

清代的李元复在《常谈丛录》一书中说，汉代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就有了雕板印刷术。

清代距汉代很远，这些说法，缺乏有力的根据，又无实物可证，一般认为是臆断，不可信。

二、六朝说

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引用19世纪法国人古伯里的说法，他根据《蜀志》、《后周书》提出晋咸和时，蜀中成都已有雕板印刷图书。

日本人岛田翰认为北齐以前已经有了雕板印刷术。他说：“予以为墨板，盖昉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提到：江南书本‘穴’皆误为‘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板矣。”

（见《古文旧书考》卷二）

后人查《蜀志》、《后周书》找不到古伯里作为根据的记载。一般认为“书本”不能断定为印本。所以，“六朝说”也缺乏充足的根据。

三、隋代说

明朝的陆深在《河汾燕闲录》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另一位明朝人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里也持同一观点，认为“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两种明代著作所持看法的根据是隋朝费长房所著的《历代三宝记》一书。这本书中说：

“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对于这一段话，多数人认为这里的“雕”是雕塑的意思，撰是撰写的意思，即雕塑神像，撰写佛经，与雕板印刷无关。清初，王士禛在《居易录》中已指出这个错误，但近人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又重提出隋代发明说。并根据罗振玉的《鸣沙山石室秘录》断言，隋代已有印刷的图书，即敦煌石窟中所藏的一部书是宋代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刻《大隋求陀罗尼经》。通过到大英博物馆看这部书，原书标题是大“随”而不是大“隋”，“大随求”是梵语，意为“大自在”，并查出唐代才由梵文译为汉文，不会在隋代出现。

这一说法否定之后，现代在新疆吐谷沟地区发现一块纸片，上有文字“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

之。”延昌三十四年为隋开皇十四年（594），又提出隋代发明了印刷术，这是印刷的。近些年来，这片字纸经过鉴定，不是印刷品，而是手写，又一次遭到否定。但仍有人认为，实际上隋代已发明了初期的印刷术。

四、五代说

宋人王明清《挥尘余话》卷二说：“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饒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明代人罗颀在《物原》中说：“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另一位明代人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令国子监校完《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始也。”还有一位明代人杨慎也说：“孟蜀后主，崇尚《六经》，恐石经本流传不广，乃易木版，宋世称刻本始于蜀也。”清人万斯同也持此说，认为“按《五经》镂板……世言冯道始镂板……而创始之功实被于万世”。（见《唐宋石经考》）

其实，在五代以前，从文献到实物都已证明，已有了印刷的图书。

五、唐代说

唐朝人司空图在《一鸣集》中写有一篇《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募化雕刻律疏》，标题下有“印本共八百纸”的注文，在疏内又有“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镂。”说明已有印本图书。《一鸣集》的序是在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司空图自撰的。王谔在《唐语林》说：“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意思说明僖宗时已有刻印历书出售的。随唐僖宗入蜀的柳玘也有类似的记叙，在《家训·序》中写道：“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小学字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见《旧五代史》卷43）柳玘这段记载是他亲自经历的，可信，从中可以看出他见的印刷书虽然质量不高，但确已是印本书。所以宋人叶梦得在他所著的《石林燕语》中说：“世言雕板印书始自冯道，此不然……柳玘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不如今之工。”这话是有道理的。另一位宋朝人朱翌在《猗觉寮杂记》里也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

唐代发明印刷术不但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存世。现代人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介绍说，《开元杂报》是唐代雕板印刷的。唐代“开元”是公元713—741年间，“杂报”是一种宫廷邸报，和以后的“宫门抄”相似，专报道皇帝的言行，如：

“二月

壬午

上幸凤泉汤，癸未、还京师。

三月

丁卯

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

孙毓修说，湖北江陵有个杨姓，家中藏有7张《开元杂报》，每页13行，行15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1958年方汉奇在《北京日报》发表《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一文，也介绍《开元杂报》。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承认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报纸。

至于雕板印刷的书籍，现在存世的有5种。一种是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一种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刻印的历书，一种是唐末中和二年（882）剑南四川成都樊赏家历书残叶；一种是1954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陀罗尼经咒》。另外，据1979年《书林》杂志第2期刊载，南朝鲜于1969年发现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说是公元704年至751年间的印刷品，如果属实，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本书籍。

上面说到的《金刚经》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窟中发现的，后被斯坦因盗往英国，被收藏在英国博物院图书馆。卷首印有释迦牟尼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图，（见图十）后为《金刚经》全文。卷轴本，全卷长约1丈6尺，高1尺，由7个印张粘连而成。此书明确题刻“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这部卷子，刻工的字体浑朴，墨色鲜明，充分表现了已具备较高的雕板印刷技术。这证明了我国在公元868年以前若干年已经发明了雕板印刷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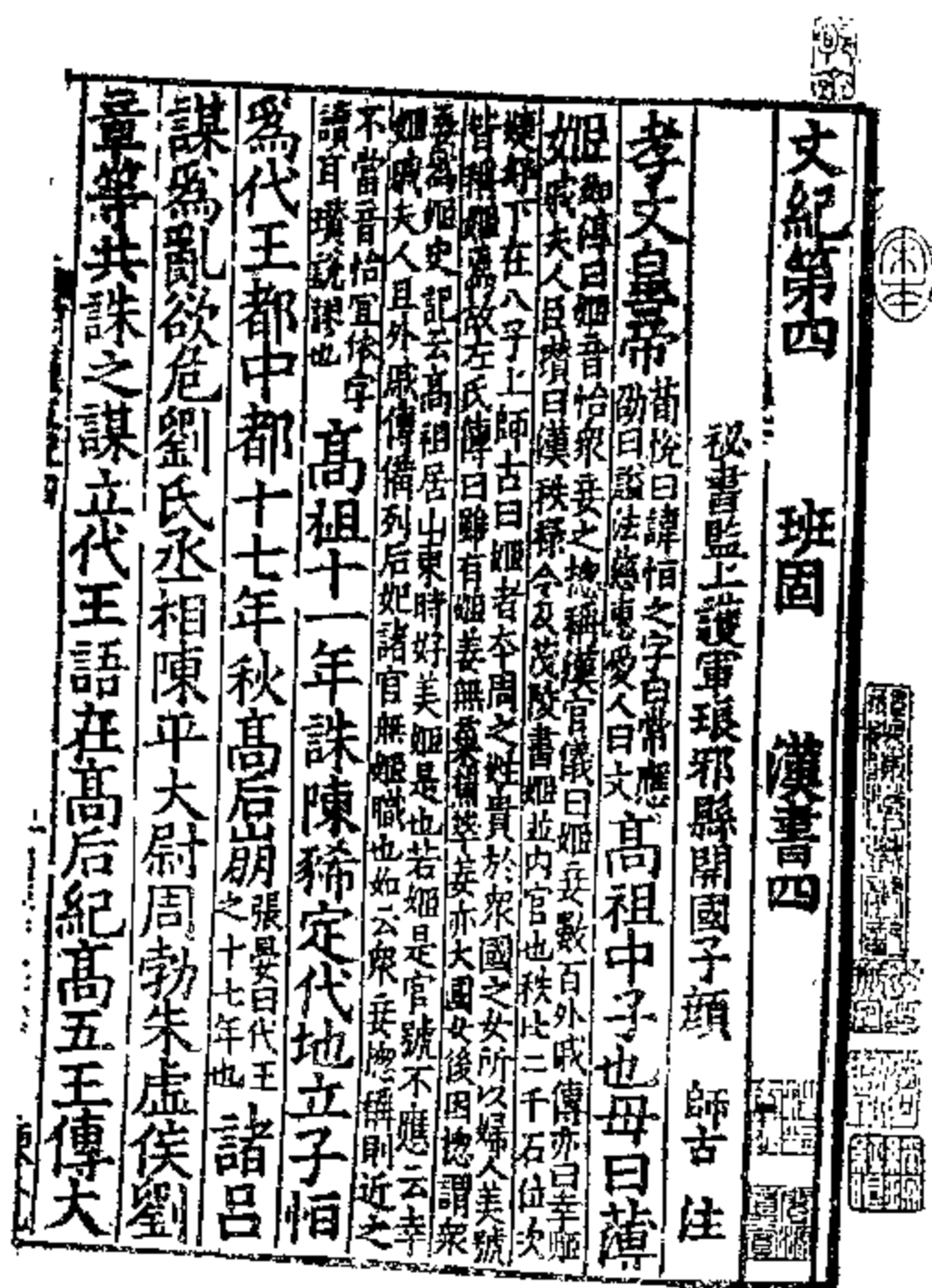
图十：《金刚经》卷首图

总之，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术的发明一样，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突然发明的，它是在拓片，印章等的启发之下，经若干辈人不断实践而积累起来的成果。

十一、宋代以后的雕板印刷图书

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上，两宋时期被公认为黄金时期，后世以得一宋版书而感到非常高兴，有的藏书家将斋名堂号题为“丽宋楼”，“百宋千元”，“百宋一廛”……，以有宋版书为荣。（见附图十一）。

从历史上看，雕板印书事业，到了宋代，十分昌盛，不



图十一：北宋景祐本《汉书》

仅官府乃至宫廷都刻书，私家、坊间也刻书成风，他们起到了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作用。

再度统一中国的宋代，政治安定，经济上相应发展，统治

者提倡学术、崇尚文化，改进了科举制度，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宋代的图书出版已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三大刻书中心。

宋代刻书的内容十分广泛。宋代以前，我国的图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释家经书也不少，除这两项以外，其它内容所占比例很少。到了宋代，则史书、子书、医书、算术、唐宋诸家的总集、别集，都有出版，大型的类书也刻印问世。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太宗赵光义继位，从太平兴国二年（977）起命令李昉等人纂修了三部大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始编自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八年（983）完成，宋太宗每天阅览3卷，全书1000卷，用一年时光读完，将原题为《太平编类》的这部大型类书赐名为《太平御览》。这在当时不仅是最大的一部类书，它采撷了宋以及宋以前1690种图书分55门汇编，也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雕板印成的图书。《太平广记》共500卷，采自345种古代奇文秘籍，将一些流传不广的“轶闻琐事、僻籍遗文”保存了下来。《文苑英华》1000卷，收梁末至唐末的赋、诗、文19102篇。这三部大型图书的雕印出版标志着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层次。

宋真宗赵恒学了他父亲的做法，即位以后，令王钦若等人编了一部1000卷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由国子监刊刻出版。这期间，司马光写成了第一部大型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共294卷，也由国子监刊印。后来南宋时两浙东路

茶盐司使库等也曾重刊。

唐代佛教的释藏编写很多，现存最早的印本书也是佛教的经典，宋代仍然崇尚佛教，并大量雕印佛教经典。宋初，即印成《大藏经》共5048卷，装480函，共有雕版13万块，后世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卷帙之多超过《太平御览》。宋神宗时，福州又刻了一部《大藏经》，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刻完，共6434卷。以后，这种大型释藏又刻过几次。可见宋代出版大型图书的能力很高。

宋太宗时，道教也很流行，宋真宗命王钦若广求道教著作，广及诸子百家，印成《道藏》，皇帝赐名《宝文统录》，共4359卷，宋徽宗再次雕印，增至5387卷，世称《万寿道藏》。

宋代出版的图书，各地区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但也有共同之处，不论官刻，私刻和坊刻，在书写艺术和刻印技术上都已趋成熟。从字体上看，北宋早期多用欧体字，瘦劲、秀丽，字形略长，转折笔画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体，字形肥胖。南宋以后又尚柳体，笔划有力，横轻竖重。从地区差别来看，浙江多用欧体，字画认真不苟，版心多是白口，有上鱼尾；福建多为柳体，起落顿笔，结构方正，多用黄麻纸；早期线黑口，后期粗黑口，四周双边。四川字多颜体，版式赏心悦目，多为白口，左右双边。

宋版书主要是蝴蝶装、旋风装、经折装，到南宋时出现了包背装。

宋版书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今天我们广泛采用的铅活

字，其字体是仿宋版书，叫做“仿宋字”。许多古代著作，由于宋代印刷出版，数量增多，得以存留后世。并且从宋代开始，中国图书传入外国的也日趋增多。

宋版图书今天为国内外所一致重视，有几方面原因：

一、宋版书被公认为善本，它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

二、宋代至今已七、八百年了，多次战乱使宋版书能保存到今天的为数很少，“物以稀为贵”，不但北宋刻本价值连城，南宋本也是稀世之宝，连残卷只纸，也是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三、宋代著作，当世之作属于原版，宋前著作由于当时靠近原著时间，最接近于原著，内容比较精确，学术价值高，如北宋徽宗时所刻《五代史》与后代刻本相较，在《孟方世誉》中有一句为“金俊以为然，军湓水之西，……”而后世本无“湓水之”三字，就难理解这句话了。这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四、宋版书大部分刻书、雕梓、印刷十分精美，从艺术角度来看也是珍品。

所以，早在清代已以宋本为贵，常熟翁覃溪得宋版《注东坡先生诗》后，视若拱璧，题其堂为“宝苏斋”，并于每年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招集宾朋，共赏此书。

元代继承宋代的图书出版事业，统治阶级虽不重视图书，但广大汉族人民极力模仿宋代，在文化事业上做出了贡献，因而元代图书也受到珍视。

明代，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图书出版数量很多，内容也十分广泛。

从宋代开始以迄清代、图书出版分做三大系统，即官刻、私刻和坊刻。

官刻，称官刻本，是官办的图书出版事业，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具体地说，中央有国子监、各院署；地方有各州、郡、县以及儒学、书院。官刻也包括了皇室系统，从皇室内的殿本、内府本到分封的藩王出版的图书。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中央的刻书机构，出版的书称“监本”。北宋的国子监刻有《经典释文》等书，南宋监本有《尔雅疏》等。明代在南京、北京两地都设有国子监，所刻的图书分别叫“南监本”和“北监本”。

中央机关，宋代除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都曾刻书。元代刻书的有兴文署和艺文监，艺文监中艺林库掌管藏书，广成局掌管刻书。其它如太医院也刻过医书。

明代还有“内府刻本”，是皇帝宫廷内部刻印的图书，由司礼监主持，由经厂刊刻。经厂出版的图书，最初只供宫内阅读，以后扩大了刻书范围。明代官刻本中，刻印最好并且校勘精当的是藩刻本，即明代皇帝分封各地王子所刻印的图书。

地方官府刻书也很多，宋代全国各路、府、州、郡、县都设有儒学，这些儒学刻了不少书，但以经史为主。元代建立书院、刻书很为精致。宋代的地方机关刻书，依其官署名称分为：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等等。

如宋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书较多，其中《周易注疏》等刻工很精。地方政府用公库钱刻印的书称为“公使库本”。

家刻本是指私人刻印出版的图书。自宋代以迄清代，私人出版图书之风很盛行，它在图书出版的总数中占有很大比例。析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一、图书刻印逐渐成为商品，但还不象其它商品那样单纯的商业化；二、某些有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喜爱图书，刻印传播，以保存传统的文化；三、以藏书表示风雅，继之又进行刻书；四、把自己本人或祖先的著作刻印出版，以传久远。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所以私人刻书数量很多。

在家刻本中，由于有些人酷爱图书，具有知识，又有一定资财，所以有些出版的图书是精心校勘、精心刻印的，质量比较高。明代嘉靖间，袁褧说：“余家藏书百年，此本甚称精善，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榻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徒曰开卷快然。”

私人出版的书，往往印有某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为标记。如宋代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春秋》等书，元代平水进德斋曹氏刻的《中州集》，岳氏荆谿家塾刻的《春秋经传集解》，余氏广勒堂刻的《新刊王氏脉经》，明代吴县袁褧嘉趣堂影刻的宋本《大戴礼记》，吴县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等，皆选本好，刻印好，属于善本书。

明代万历以后，图书出版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一时间，士大夫们竟以刻书为荣，有的搜罗古籍秘本，

校刻行世，以示自己的博雅；有的刊刻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也有剪裁旧章，集句类编，以利考场应试；又有选辑诗文，施加评点，以供揣摩。”（见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刻书家，包括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汪廷讷、毛晋等。如吴勉学刻有《资治通鉴》等百余种，胡文焕刻书中仅《格致丛书》即有158种。毛晋是藏书家也是刻书家，堂号称“汲古阁”。

图书从宋代开始，成为有专业经营的商品，图书出版逐渐商业化。从文献记载和传世的古籍来看，宋元时期在许多城市已有了书铺。这些书铺，有的是卖书，只销售；有的则刻印、出版图书。有些书铺叫“书坊”，所以它们刻印的图书被称作“坊刻本”。有的书铺也叫作“书堂”、“书籍铺”、“经籍铺”、“书棚”等等。现有的一部南宋刻本《抱朴子内篇》中，就有一页印有牌记，上书：“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现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诸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诸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发六月旦日。”如另一本宋刻的《唐李堆官报抄策》上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元代书坊不少，其中如勤有堂、慎独斋等，到明代还继续刊集图书。

明代的民间坊刻本，不仅出版经史之类图书，还与官刻、私刻不同，出版了大量民间群众喜爱的戏曲、小说、医学以及日常生活常用的图书。

明代，书坊集中的地区中，福建建阳自宋代以来刻书之

习未衰，嘉靖间杨氏清江书堂出版了《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8卷，倡导了小说图文并举的先河。詹氏进德书堂的《大广益会玉篇》又开创了图书带版画插图的先声。南京在明代称金陵，也是书坊众多的城市，著名的有富春堂、文材阁、广庆堂、世德堂、万卷楼等。它们出版了许多戏曲，如富春堂印成《绣刻演剧十本》，每种均配有插图，称“出像”。杭州也从南宋起就是重要的图书出版中心。北京则有永顺书堂、岳家书坊、汪氏书肆等书坊。

坊刻本由于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就其出版质量来说，一般逊于官刻本和私刻本。

十二、印本时期的写本书

从宋代开始，印本图书逐渐增多，明、清两代的图书，印刷本已占绝大多数。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在印本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写本书以它特有的生命力仍然产生，并且数量还不少。

在各种写本书中，又可具体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稿本。稿本当中，一部分是作者写成以后，既未被传抄，也没有印刷出版，这些著作形成“孤本”，古代的这类稿本传世不多，大多受到重视，列为“善本”。又一部分是在被传抄以前或印刷以前作者的初稿本或清抄过录一遍的清稿本。这类手写本，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因为每一

种图书，都是先由作者写出初稿，加以过录誊清，古代进行传抄，近代以来主要再进行排印出版。由于手稿本最能代表著作人的思想，是第一手的科研资料，很受人们的重视，但在图书发展史上数量甚少。

二、抄本，也叫手抄本，传抄本。一种著作写成以后，有印本出版，还有写本流传，这种写本叫做抄本。在古代，许多图书印量不多，为能获取这些书，要靠抄本；有的是“禁书”，也靠抄本流传；有的在印本问世以前，先以抄本流传，如《红楼梦》就是先为抄本，因读者很多，才刻印出版，《聊斋志异》等书也是这种情况。小说、戏曲等著作，因为在封建社会被看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然而读者却十分欢迎，所以往往以抄本形式流传。

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盛行，许多藏书家对一些珍贵图书十分爱慕，却又无法买到，往往本人或雇人抄写图书。另外，图书成为商品以后，社会上一些贫苦的读书人也以抄写出售图书作为一种职业，叫“经生”或“书傭”。这样，抄本书便具有一定的数量。

三、写本。这里指不再印刷出版，只用手写传世的图书。

在印本图书大量流行的同时，我国出现了两部著名的大型写本书。

明朝，成祖永乐六年（1408）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这部类书共22937卷，约3亿7千万字，分装成11095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

编辑《永乐大典》的时候，还是明朝初期，当时还有大量唐、宋时期的图书可以见到，所以它收集、保存了许多此后无传世之本的图书。永乐间能见到的书，300年后的清代乾隆期间已有许多佚失，幸赖《永乐大典》，因而从中辑佚出的古书达385种之多。

《永乐大典》是从七、八千种古籍中辑录编排而成的，其内容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尤其是农学、科技、手工业、民俗文学等素不为上层看重的图书，也都辑录在内。参加编纂工作的先后有2169人，是世界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因字数甚多，卷帙浩繁，没有印刷出版，只有手写本。但究竟一共写了几部却一直搞不清，被称做“《永乐大典》之谜”。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编纂缮写完成的，初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12）迁移到北京。嘉靖三十六年（1557），有一夜宫中突然失火，明世宗在深夜先后三次下旨抢救这部巨著，幸免于难。

于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保存好这部“巨著”，又重抄了一部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完成。以后，内廷又发生了一次火灾，并烧掉了一部《永乐大典》，但是烧掉的是正本还是以后的重抄本——副本，其说不一。又有人说，嘉靖间并不是重抄了一部而是重抄了三部，一共有三部。

1961年5月14日《光明日报》载《永乐大典漫谈》一

文，其中说：“……或谓嘉靖间抄了两个副本，可是另一个副本也不详其下落。”该报5月25日，又刊载了《关于〈永乐大典〉的谜》一文，其中引《韵石斋笔谈》说：“《永乐大典》初拟木板，以工费太繁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重录正副两本……明季兵兴，南京本及皇史宬本并毁，唯文溯阁本岿然尚存。”认为先后共有三部，均为写本。

硕果仅存的一部，清代已开始有所散佚，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大肆劫掠，《永乐大典》一部分被焚烧，一部分被劫至国外，宫内所存无几，后归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保存。全国解放以后，刻意搜求劫余，苏联、德国也交回了部分卷册，1960年中华书局将汇集的215册影印出版，使这部历史上的大型写本书有了印本。

《永乐大典》原本为四开大本，包背装，绢面，带有插图，用朱墨两色写正文与注文。

第二部大型写本书是清代乾隆间编成的丛书——《四库全书》。

清王朝政治形势稳定之后，标榜发展文化，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模仿康熙的作法，他也举行“博学宏词”考试，编辑刊行许多“钦定”著作，下令广泛收集天下遗书。全国各地公、私藏书家先后进书12176种。

清廷以征书之名显示“稽古右文”，但乾隆“寓禁于征”，在征书当中大量禁毁图书，甚至对于著书或藏书的人加以迫害。如反清等内容的图书，有的全部销毁，有的抽去

了所谓“违碍”的部分，并列成禁书目录，公布于全国，据统计共达2000余种。

除禁毁，违碍等内容的图书以外，从全国征得的大批图书可分做内府藏本、地方进呈、私人进呈、辑录《永乐大典》等几方面来源。这些书的一部分编入《四库全书》，一部分只作为“存目”，即只编入书目，使人知道有这样一些书。

古代图书自晋代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并以四库贮四部之书，所以这部大型丛书叫《四库全书》。编入全书的共有3461种，79309卷，分装36078册。

《四库全书》没有印刷，只是手写本，所收入的图书版本经过精选，学术质量也较高，所以这部书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它是我国图书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部写本丛书。

《四库全书》用开化榜纸、线装、红印朱磲红格，抄写时半叶8行，行21字。书皮用绢，丝线装订。四库封面分别选用四种颜色，经部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是灰色。

作为写本书，《四库全书》最初缮写了4部，分藏故宫文溯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写成了3部，藏于南方的扬州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七库之写成，是3000余人经10余年努力劳动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代后期，七阁藏书先后遭到了损失，太平天国战争中文宗阁、文汇阁全部毁于战火，杭州文澜阁藏书也损失过半，后经丁氏从民间搜集所缺，并到北京等地抄配，基本配齐。文源阁也在火烧圆明园中同遭火焚。

辛亥革命后，原藏热河的文津阁藏书移于北京图书馆，该馆所在亦称“文津街”。文渊阁一部存于台湾，文溯阁一部初由辽宁省图书馆保藏，1966年调至甘肃省图书馆珍藏。

台湾所藏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先后由台湾和大陆影印出版，这部写本鉅著，也得有印本存世，使古代著名图书可以为广大读者所用。

十三、册叶制度的版式和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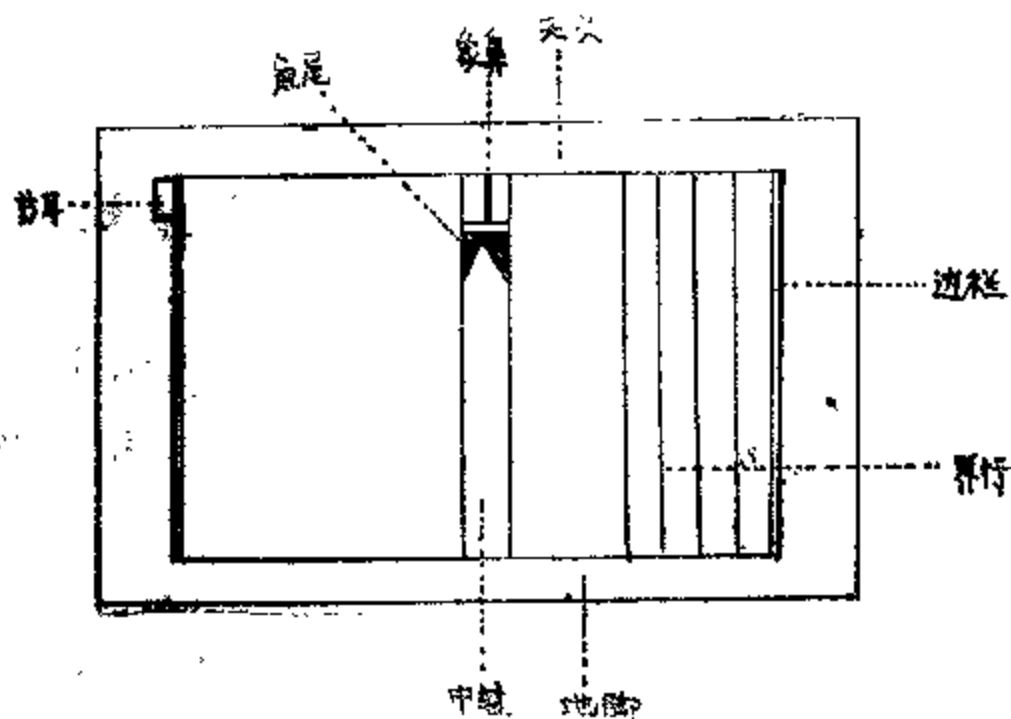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的图书，从简策、卷轴到册叶制度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版式，它的起源始自雕版印刷术，但活字印刷书和写本书，也大多与此相同。

册叶制度的确立与雕板印刷的流行是互为因果的。册叶的特点是从一长卷到一单叶，这正是雕板印刷的形式与特点。雕板术是单面印刷，用木板来雕刻成板，亦称“槧”，宋代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说：“此帙所录杜子美诗，颇与今行槧本小异。”这里的“槧本”即刻本。

刻书用的木板，一般宽约1尺半，高约7—8寸，这些木板刨平以后，往上写字，字的面积一般占木板的70%—

80%，上边的空白叫天头，下边的空白叫地脚。字的周围大部分有边框，这边框有单线、双线之分，叫“单栏”或“双栏”，并按其位置叫“左右双栏”或“左右单栏”。字行之间，有时也有栏，叫“界行。”

一块木版刻一页书，一页又分两面，中间部分叫“版心”以版心为中进行折叠，版心上一般刻有书名、卷数，有时也把刻工姓名刻在上面，为了折叠方便，还用了图案，叫“象鼻”和“鱼尾”（见图十二），鱼尾有的只在上面有，有的上下都有。这种版式在我国流行了上千年。



图十二：册叶制度的版式

象鼻处空白或只有一条细线的叫“白口”，线粗或全黑的叫“黑口”。北宋时期，多是双边、白口、字大、行宽；南宋逐渐流行黑口，由小黑口到大黑口，多为双边、字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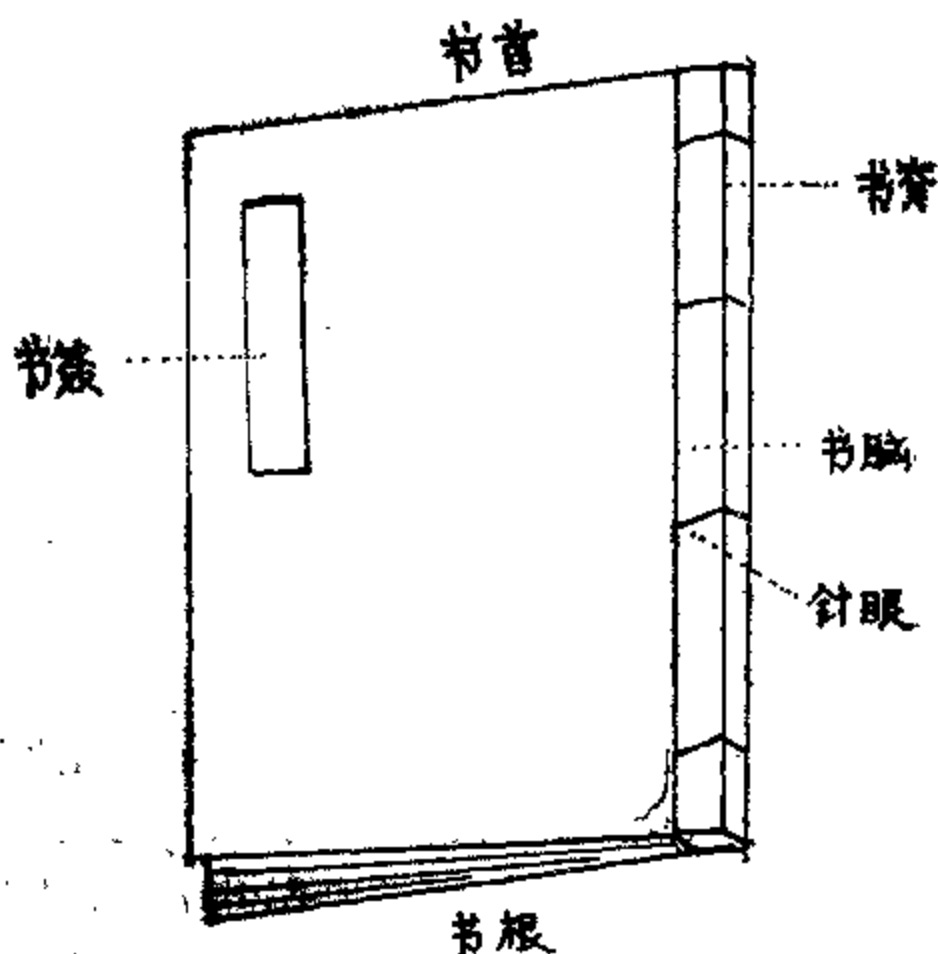
行密。刻书的字体，北宋多用欧阳询体，后来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元朝字体圆活，多用赵孟頫体。明初与元相同，嘉靖以后，模仿北宋发展成为方笔，明末清初成为横轻直重、横细直肥的方块字，虽称“宋体字”，实际上是仿宋的变形。

明代初期与元代相同多为黑口，印书之纸少数为麻纸，大部分为棉纸。明中叶，又为白口，仍用白棉纸，明后期黑口亦很少，但竹纸为多。

一部书是由若干页组成的，作为线装书，是用线来装订。一般用清水白绢线双根订法。钉线有四针眼、六针眼、八针眼三种。

除正文叶子以外，每书有书衣，俗称书皮。钱曾述古堂的书衣，用自造五色笺纸，毛氏汲古阁用宋笺藏经纸或宣传纸，染上各种雅色。后代，许多珍贵图书还用绢、绫来做书衣，颜色也各有不同，如《四库全书》用四种不同颜色来代表经、史、子、集四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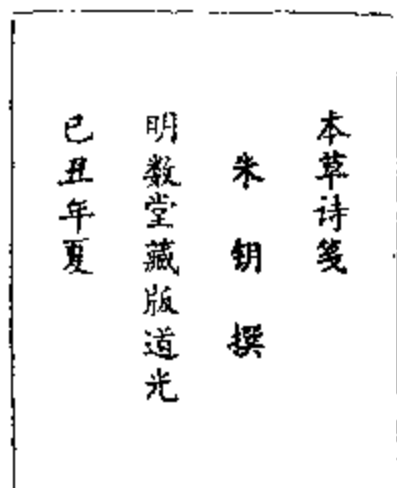
古代图书与现代图书的不同处是书衣只起保护图书的作用，而不写书名、著者等内容，因而许多书在书衣上面另贴上“书签”。以写书名及作者，这些书签不是图书出版单位所贴，而是读者得书以后自己所加。《藏书纪要》说：“用宋笺藏经纸古色为上，然亦视书衣之颜色为准。……签要款，贴要整齐，不可长短阔狭，上下歪斜，斯为上耳。”清代后期，有印刷的书签问世，甚至仿书签样式，直接印在书衣上的。（见图十三）



图十三：册叶图书

书衣之内是书名页，古代也叫封面、内封面、封内大题。这是出版者用以标识书名的，有的包括著者、出版者。如：

书名页后有的加有牌记，尤其是书名页只有书名的往往有牌记，它相当于现代图书的



“版权页”。有的带有广告性质，详略不一。如《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一书的“牌记”为：

是集因无锡板差讹太多乃
曾荆校正无差谨告四方
贤名士大夫君子须认此板
三衢 叶宝山堂为共故票

在书名页和牌记之后，往往有一张空白纸，叫做护页或扉页，这一做法，现在仍继承下来。

古代图书装订的一边，锥眼钉线的地方叫书脑，装订的侧面叫书脊或书背，打开的一面叫书口。

书的最上端叫书首，也叫书头。最下端叫书根，因为古代图书在书架上多不站立而是卧在架上，所以往往把书名和卷数写在书根上。在第一本上，写上本书一共几册，称“卅”几册，如一种书共6册，在其第一册上写“卅”，在二、三、四、五册上分别写上数字，在第六册上写“奎”。

周南关雎诗训传第一毛诗国风
郑氏笺

每一卷书正文开始之前，要写上全书的名称、卷数，本篇的名称、著者。对于著者往往要写上官职、籍贯。这叫做“卷端”。从简牍时期开始在写卷端时，先把篇名写上，再写书名，如：

古代图书在写著者时也十分复杂：如《片玉集》一书卷端著录作者时为：

“庐陵陈元龙少章集注

建安蔡庆之宗甫校正”

“庐陵”，“建安”都是地名，是作者的籍贯，陈元龙是姓名，少章是他的字；蔡庆之是姓名，宗甫是他的字。

有的连官职、封号都写上，如《稽古录》一书为：

“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臣司马光奉敕編集”

以上只有“司马光”三字是著者的姓名。

古代图书的内容结构，一般除正文以外，还有序、目录、凡例、跋等部分。

序、跋都是有关正文的说明，一般正文之前称序，正文之后称跋，有作者自己写的，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许多图书都有若干篇序或跋，尤其是多次重刻的图书，往往重刻一次便有一篇序。

古代经、史图书大多有注释本，因而正文当中，每一段或每一句下面接着是注释。注释文字多数采用比正文字体小的方式，如正文大字一行，注文小字双行；有的采用不同颜色，如正文墨笔，注文朱笔。还有一种“集注”，把几种注释集中列在正文之后。有的“注”带有评论性质，叫“批”，如金圣叹“批”《三国演义》，印刷形式同注一样。

古人对手写的书称“本”，雕印的书称“版”，大约在宋代形成一个词“版本”。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唐以前书籍皆是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唐

《汉书》付有司掌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而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误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最初版本是区别写本的，以后有了“版本学”，它的涵义包括各种方法形成的图书彼此之间的不同。

古籍的版式，无论刻本书、写本书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字印刷的使用。我国是发明造纸术、雕板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发展迟缓，长期不变，固定的版式影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因为传统版式要加边栏、界行，正文又分大、小字，对雕版顺理成章，用活字就十分不便了。

十四、活字印刷种种

我国发明了雕板印刷术，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把图书的发展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这是我国对世界文化事业的又一伟大贡献。

雕版印刷比写本书是一次革命，是一次飞跃，雕板印刷也有不足之处，一板之上若有错字订正很难，一块木板用完之后就没有用处。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实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我国宋代的毕昇，他比谷腾堡要早400年之久。

（一）泥活字印刷

如果说雕板印刷始于何时还缺乏明确的记载，那末活字印刷却有着准确的文献根据。宋代人沈括写了一部书叫《梦溪笔谈》，其第十八卷《技艺》中记载了这一史实、文中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少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沈括与毕昇都是钱塘（今杭州）人，沈括生年略后于毕昇，毕昇死后，他的活字为沈氏子侄得到。所以，沈括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庆历”，是宋仁宗年号，时间为公元1041—1048年间，可见900多年以前我国已发明了活字印刷

术，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圣经》是1456年，已迟了整整400年。而毕昇的活字技术已与现代基本一致，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不久，到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在潭州（今长沙）用沈括记的毕昇方法刊印了他所著的《玉堂杂记》一书。这在周必大的《文忠集》第198卷中有这样的记载：“近用沈存中（按：沈括的字）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事迹广泛流传，并被今人拍为电影，上了银幕。但是，宋代用泥活字印刷的图书实物多年来未为人看到。

1965年浙江省温州市在市郊白象塔出土了一批北宋文物，其中包括佛经。1987年在研究这批文物时认为其中的一件印经残叶是北宋时期用活字印刷术印成的。白象塔建于宋政和五年（1115），残经出土于塔之二层三面墙壁内，同层出土的有至道二年（996）、景德二年（1005）的彩塑、铜钱，崇宁二年（1103）墨书的《舍经缘起》，金柏东据此考证这部残经是崇宁二年所印，上距毕昇首创活字印刷术约50余年。所以考证为活字印刷有这样四个特征：

一、宋刻本一般字大、疏散，活字则字距紧密无间，有的首尾相插，这是活字特点。

二、雕板字体浑朴厚重，泥活字拙劣、字体长短大小及笔画粗细不一。

三、不但有漏字、空字，并且有倒字，只有活字印刷才会出现字倒置，雕板印刷不会出现这一情况。

四、活字版面不平，出现印出来以后着墨浓淡不一。

出土的这件活字印刷物为《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十分之一：“……映饰。妙真珠网……见无量寿佛者……”此经残宽13厘米，残高左8.5厘米，右10.5厘米，纸色虽已发黄，但质地坚韧柔软，类似棉纸。（以上见：《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

这一活字印刷图书实物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元朝初年，用泥活字印成了《近思录》、《小学》、《经史论说》等书。清代，泥活字仍然流行，道光十年（1830）李瑶在杭州用泥活字印成了《南疆绎史勘本》等书，他自称为“仿宋胶泥板”，“仿宋”即指仿宋代毕昇的泥活字术。道光二十四年（1844）安徽泾县翟金生，经30年时间，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字体有大小5种，近似现代活字的大小不同字体，印成了《泥板试印初编》、《仙屏墨屋初集》等书。总的来说，由于“泥”做材料有容易断裂的缺点，所以使用不够广泛。

（二）王祯木活字

发明泥活字的毕昇是一位不知名的“布衣”，发明木活字的王祯是一位著名的农学家。

王祯，字伯善，元代山东东平人。他曾担任过安徽旌德县和江西永丰县的县官。他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总结了历代农业经验及自己的体会写成了著名的《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学专著，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也被称作“王祯农书”。在这部农业专著后面，附有一篇《造活字印书法》，介绍了他所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并附有插图，这是我国早期一篇重

要的图书印刷技术文献。

王祜选用木头做为活字的材料，这是对雕板技术的改革。他深感一书出版，刻板甚多，于是同雕板技术一样，利用木板写上文字，再刻凸板，然后以“字”为单位，用锯分开成为一个一个的单字。在排印时，做一木框，每行字之间隔以竹片，这大体上与现代印刷术相一致。活字印刷，因活字很多，排在架上，工人捡字要站着进行，十分劳累。他还发明了“轮转排字架”，工人坐着即可捡字。在《农书》的附录里有一插图，就是这种排字架，这也应是王祜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如果是在今天，应该申请专利权了。元代大德二年（1298）他请了匠人用这种方法刻制了木活字30000多个，并印刷出版了他编写的《旌德县志》，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印了100部。可惜的是王祜自己印的木活字本没有传世。

王祜刻印《旌德县志》不久，元至治二年（1322）浙江奉化州官，广平人马称德刻制了木活字10万多个，印了《大学衍义》等书。敦煌发现的大批古籍当中，虽没有活字印刷实物，却在洞中见到了几百个硬木刻成的活字，是回纥文。

明、清两代，用活字印刷出版的图书中，以木活字占多数。采用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图书，出版单位广及苏州、杭州、南京、福建、四川、云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从官方到民间，几乎各省均已采用。由于“活字”读音被认为“不雅”，开始用“聚珍”一词，木活字印刷称为“聚珍板”。

清廷在图书出版中也积极采用活字印刷术，各种活字都被试用。乾隆间用木活字印刷出版了一套丛书。清廷内由武英殿负责图书出版，这套木活字印刷的丛书便题为《武英殿聚珍板丛书》。

清代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从明代著名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一批在清代已不见传世的古代著作，为了使这些佚书得以继续流传，决定重新出版。刑部尚书、朝鲜族人金简负责此事，他鉴于铜活字易失，建议采用木活字。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奏请皇上，说：“……将来发刊，不唯所用板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惟，莫若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印刷各种书籍，比较刊板，工料省简悬殊。臣谨按《御定佩文诗韵》，详加选择，除生僻字不常见于经传者不收集外，计应刊刻者约六千数百余字，此内虚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共需十万余字。又预备小注应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需五万余字。大小合计，不过十五万余字。遇有发刻一切书籍，只须将槽板照底本一摆，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间有不敷应用之字，预备木字2000个，随时可以刊补。书页行款，大小式样，照通常行书籍尺寸，刊作木槽板20块。临时按底本将木字捡校明确，摆置木槽板内。先刷印一张，交与校刊翰林处详校无误，然后刷印。”这套《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共134种，达2300多卷。当时在全世界，汇集这样众多图书以活字排印出版，也是罕见的，实是我国木活字图书之大观。金简所写的《钦定武英

殿聚珍板程式》一书，是活字印刷术中继沈括、王楙之后又一重要文献。

政府采用木活字后，民间仿此者亦复不少，如吴门汪昌序印有《太平御览》1000卷，张金吾印《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等一大批图书，到清朝后期，有书店称“聚珍堂”，以印活字书为主。

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元代来中国，回国以后传播了中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其中也包括了木活字印刷术。意大利人潘菲罗·卡斯特尔在威尼斯开设印刷厂，采用木活字技术出版图书。

我国在古代有类似后代报纸的出版物，叫做“邸报”。活字印刷术对报纸出版来说，显然优越性更大，所以，早在明代末年，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用木活字印刷《邸报》。清朝的政府公报叫《京报》，从乾隆到清末也是用木活字排印的。

（三）金属活字

泥活字容易断裂，木活字容易磨损，时间稍久便会缺笔少划，从元代开始，我国已在实验和应用金属作为制作活字的材料。

铜冶炼术是劳动人民最早掌握的冶金术，铜活字印刷术也是最早的金属活字。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铜活字，还没有确切的记载和可提供的实物。有人认为宋代已用铜活字印制“九经”，有人则认为元代用铜活字印过《御书策》，但都没有被公认。明代，无锡华氏家族是致力于铜活字印刷的人

家。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出版物《宋诸臣奏议》，是明弘治三年（1490）华燧出版的，他的叔父华理于弘治十五年（1502）用铜活字印了《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杂书，华燧的侄子华坚、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印过《蔡中郎集》等书，无锡华氏家族先后用铜活字出版过几十种图书。

值得介绍的铜活字图书有清康熙末年开始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年间，编成了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大型类书，被西方叫做《康熙百科全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达10000卷之多，是古代最大的一部印本书。因《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均是写本书。为了印刷这部大型图书，清廷采用了铜活字，亦有大小两种字体。乾隆在题武英殿《聚珍诗序》中说：“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印刷，工毕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懼得咎，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所得有限，所耗甚多，深为惜之。”

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采用了铜活字，道理与金简所讲一样，这样的大型图书，还是活字为宜。但这部类书只印了64部，每部10040卷，分订5020册，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图书出版。

铜是一种冶铸货币的原料，所以铜活字渐渐为人盗卖，残缺不全，印了《古今图书集成》，以后没有再印第二部书，十分可惜。

我国发明了活字印刷，并且到清朝末年已有900年的历史，但始终未能代替了雕板印刷术，有人根据《增订四库简

明目录标注》统计，清代所存的20000种图书中，活字印本只有220部，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清朝末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才迅速取代了雕板印刷。

为什么我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图书出版事业中未能普遍采用呢？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1.封建社会因循保守，不愿进行改革，崇古簿今，对古代木板不愿取代。这是封建意识带来的因素。

2.主要是在选择活字材料上，始终未能获得理想材料，泥易断裂，木易磨损，所采用的铜、锡、铅是纯金属，有的不易沾墨，有的也易断损。

3.中国汉字数量太大，常用汉字已有3500多个，并且有隶、楷等不同书法，大、小不同字体，仅单字即需几万，常用字又要各制几十、几百个，因而活字要有几十万个才能应用，一般出版部门没有这样的力量。

4.古籍的版式，相沿成习，如边框、中缝、象鼻鱼尾、界行，大字正文、小字注文等，用雕板十分方便，用活字便十分困难。

明代神宗万历年间，外国传教士已将西方的铅活字（实际上是以铅为主的铅合金活字）和印刷机带到中国，万历十八年（1590）出版过拉丁文的《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在这个时期虽然活字材料、印刷技术解决了，而其它方面因素仍未解决，故未能推广，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迅速在我国推广。

十五、彩色图书与套印技术

早期的图书一般是单色书写的，以黑墨为主，间有用朱色的，如甲骨文中的刻痕里有的已填以朱色，石简的侯马盟书大多是用朱色，帛书时期，用朱色的也不少。以后又发展到一部书兼有两种或几种颜色。

从文献看，汉贾逵（30-101）著的《春秋左氏传朱墨刊》用朱、墨两色分别书写“经”和“传”。从实物看，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道德真经疏》，是以朱色写经文，墨色写疏语。在这以前，已经在图书上出现两种颜色，但并不是文字，如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中用墨笔写文字，用朱色仅作分段标记。以后，有些带有图画的图书，用不同的颜色，但也是用手工毛笔画上去的。

两种或几种不同颜色同时印成的套板印刷术，创始于什么时候，目前还有争议。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这里“双印”即指“套印”。人们常引用这段文字作为套印技术发明的开始，如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早已发明了套印技术。1947年原中央图书馆收购了一部元代至正元年（1341）资福寺刻的朱墨套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是朱色，注文是墨

色，被称为“灿烂夺目”。这部书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它比欧洲第一本带颜色印的《梅因兹圣诗篇》要早117年。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据考证是辽代统和年间（933—1012）的套印产品，有人认为是木板彩印的，有人认为是丝漏印刷的，在此之前，1973年陕西省又出土了彩印的版画，是套印还是单版涂色，有不同看法。

套版印刷术是明代开始在印刷图书中应用的。套印分做两种：一种是一块木板上，根据需要，在不同的位置上涂不同颜色；另一种是每一种颜色用一块木板，印几种颜色就用几块木板，也叫“套板”。套板，还可分做两种，即“恒版”和“拱花”，（详见下一节《丰富多彩的版画艺术》）主要用来印图画。

最早的套印技术是刻成一块木版，在不同部位涂上不同颜色，复纸以后，一次印成不同颜色的绘画，这种办法色彩鲜艳，但浓淡不易区分，并涂色费时。如万历年间徽州滋兰堂刻印的《程氏墨苑》中的《天姥对廷图》、《巨川舟楫图》和万历刻本《花史》就是用的这种方法。郑振铎谈到《程氏墨苑》时说：“……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画，当以此为嚆矢。”（见《劫中得书记》）接着有了数板套印，明代致力于套印图书出版事业的有吴兴闵氏——闵齐伋、闵齐华、闵象泰，凌氏——凌濛初、凌瀛初和归安的茅氏——茅元仪三家，尤以前二家著称。

闵氏在图书出版中，对一些著名经典，正文用墨，评注用朱双色套印，很受欢迎，以后又发展到朱、墨、黛、紫、黄五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一家批注或评点。除了四部以外，对民间流传而不为上层人士所齿的一些通俗小说、戏曲也套印出版，如《西厢记》，用朱墨套印，有图20幅。

凌濛初，字稚成，著名小说家、戏曲家，也是湖州人。闵、凌两家共出版套印图书130多种，绝大部分选纸上乘，刻工精细，套印高超，印成之后，彩色斑斓，令人爱不释手。故在套印图书方面，闵、凌并称于世。两家的雕印、版式、纸墨、颜色大致相同，难于区分。近人陶湘在《明吴兴诗文评汇刻本》中说“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者，凌刻为多；半叶九行，行十九字者，闵刻为多。……凌刻字大行疏，闵刻字小行密。”

清代前期，套印技术续有发展，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的《御制唐宋文醇》是五色套印的，雍正间刻印的《硃批谕旨》是双色套印的。再如套印的王奕清《曲谱》等书，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套印技术，它们不但色调雅致，加以墨色光泽，选用纸张洁白，使读者见之即感到怡神悦目。

乾隆年间，内府又套印出版了一些戏曲书，如《昭代箫韶》（即《杨家将》）、《劝善金科》（即《目莲救母》）水平已较差。这期间，套印书籍中如《西湖佳话》16卷，附有西湖全图及西湖佳景十图，用彩色套印，远近大小，阴阳、向背均有分别，极为精美。

嘉庆年间，将鹿车、观碑、老渔各作一图并附诗，刻为

《三图诗》，以纪念三图之吟咏。字为写体字，它用浓淡墨色套印，而不是用不同颜色，十分别致，在套印技术中，可谓别开生面。

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刻本《杜诗》，用五色套印，十分精美。所以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中说：“套板印本广东人为之最精”。道光十四年（1834）涿州卢坤刻《杜工部集》25卷，进一步套用六色。正文用墨笔，另外，紫色为王士禛，绿色为邵长蘅，黄色为宋荦……，体例分明，既便于阅读，又使人娱目怡情。又如安徽刻本《御制耕织图诗》用墨、绿两色套印，也较罕见。

套印的图书精美，又便于阅读，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但刻印当中成本极高，一直品种不多，清道光以后少有应用。

西方印刷术传入以后，用机器印刷、又有套印图书，唯多用于报纸。

十六、丰富多采的版画艺术

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图画，以后绘画在历史进程中发展为艺术。由于我国早期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术，所以绘画与雕板相结合产生了版画艺术。现存的世界最早一部印刷图书——唐代印的《金刚经》，上而就有精致的插图，已是较高水平的版画艺术。

中国雕版印刷的历史上，版画也不断产生，大体可分三

类：一类是插图，在整部书中插入一幅或几幅版画；一类是图文对照，多数是上图下文；一类全是图画，属于图册，主要是画册。

宋、元时期有《证类本草》、《宣和博古图》以及《刘向列女传》等带有版画的图书。小说中带插图的叫做“全相本小说”。

明代，版画艺术有了很大发展。明初弘治十一年(1498)有《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与小说一样图文并重。正德十年(1515)刻印的《日记故事》被认为是早期的连环图画。

明嘉靖间，河北文安人高松，字守之，工诗文，擅书画，他出版了《高松画谱》，现有《竹谱》、《菊谱》、《翎毛谱》存世。在《菊谱》一书中，用歌诀的方式谈了如何画菊：“菊瓣朝心列，横长竖短诀；参差宽处添，迎面中心结；倒悬下不丝，平头上不设。翻身看后蒂，向背分旁侧；攒三聚五头，大小宜相接，干要三五零，淡墨深压叶；焦墨分叶纹，草石间竹节。”他把绘画与版画联系在一起。从实用性的插图到明代发展成为独立的版画艺术。

明代刻书中心之一的徽州，以版画艺术著称，被称为“徽派”，独步一时，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最初，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有仇姓开始刻书，已以版画见长。仇氏衰落，黄氏继起，大批族人均从事刻书，有刻工姓名可考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可称人才辈出，万历以后黄氏中有专从事版画艺术的，如《古杂剧》、《西厢记》、《还魂记》

等戏曲的插图，以及《奕谱》、《墨谱》等图书，其中如黄廷中刻的《博古叶子》、《九歌图》等绘刻精美，为人称道。黄氏为主的徽派版画艺术从明代万历年间流传到清康熙末年，前后持续100多年。黄氏以外，如汪光华的《琵琶记》，汪士琦的《唐诗画谱》，刘荣的《凤凰山》等都有精美的版画插图。在徽州的影响之下，明代在福建、浙江、金陵等地也都发展了版画艺术。

套版印刷术流行以后，也用来套印版画，但套印的版画真实性不强，于是发明了“短版”和“拱花”这两种套印技术，使彩印版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短版”是把原彩色的画稿，按照不同的颜色分别钩摹下来，每一种颜色刻在一块木版上，然后根据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深浅，依次套印，印刷时要求位置准确。由于一些复杂的画，要有几十块木板，先后印几十次，所以印出来的颜色浓淡深浅，阴阳向背，可以与原作相近，印刷技术精巧者被誉为“可以乱真”。“短”是古代的一种点心，拼盘而食，因而叫它“短版”。这一传统印刷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至今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还继承和发扬这种短版版画艺术，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国内外的称赞。

“拱花”是用凸凹两块木板雕成，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钢印”，印刷时凸凹两版嵌合，版面花纹拱起，所以叫“拱花”，适于印翎鸟。

以前认为“短版”套印技术始于徽州的胡正言。1963年春，上海博物馆在浙江访得短版印的《萝轩变古笺谱》上，

下册，卷首有颜继祖的“小引”，说“《萝轩变古笈谱》书成于天启丙寅（1626）”，可见这时已有了恒版版画。颜继祖，漳州人，曾任太常少卿，山东巡抚，崇祯间卒于山东德州。

徽州人胡正言，字曰从，室名“十竹斋”，喜藏书，刻书，也擅绘画，因而他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笈谱》二书套印精致，娴雅妍丽，为版画艺术之精品，著称于世。后代多次翻刻。《十竹斋画谱》分“竹谱”、“梅谱”、“石谱”、“兰谱”、“翎毛谱”等。《十竹斋笈谱》分：清供、华石、博古、画诗、奇石、隐逸、写生、龙种、胜览、入林、凤子、折赠、墨友、雅玩、孺慕、棣华、应求、闺则、敏学、极修、尚志、伟度、高标、建义、寿征、灵瑞、香雪、韵叟、宝素、文佩、杂稿等。

清代的恒版彩色版画亦有不少。康熙间，李渔芥子园甥馆印的《芥子园画传》三集最为著称，芥子园是浙江兰溪李渔（号笠翁）别墅的名字，他的女婿沈心友家中有李长蘅画稿，又请王槩、王翥、王臬兄弟把它整理、增绘，用了3年的时间，成133叶，并把山水画技法整理成文，附临摹古人山水画，于康熙十八年（1679）由恒版彩印出版。

康熙四十年（1701）沈心友又请王氏三兄弟增删了杭州名画家诸羲庵编绘的《竹兰谱》，王蕴庵编的《梅菊草虫花鸟谱》，用恒板印成了《芥子园画传》的第二集，它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竹兰梅菊，下册为草虫花鸟。后来，有的书商把上册作为第二集，下册作为第三集，合为《芥子园画传》

一、二、三集，用开化纸彩色恒版精印。爱好艺术的无不以一睹为快，获得一部视为莫大快事。因流传不多，有正书局有复制本问世。这部画册，除画谱以外，还有“画学浅说”、“设色绘法”、“树法叶式”、“石法皴法”等内容属于绘画理论。

嘉庆二十三年（1818），有的书商将丹阳传真画家丁鹤州编的《写真秘诀》（又名：《传真心领》）、《晚笑堂画传》等图谱用《芥子园画传》第四集的名义出版。

恒版彩印版画，作为图书出版的不多，但作为版画艺术则十分流行，出版最多的是木板彩印年画，清代形成三大中心，即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和天津杨柳青，每地每年都有大批作品出版，行销十几个省，内容有吉庆一类的福、禄、寿、喜、娃娃、仕女、花鸟等，有些套印粗糙，也有许多精湛作品，广受群众欢迎。

另外，恒版和拱花彩印还用来印“笺谱”，以北京荣宝斋和上海朵云轩为代表，绘画精致，彩印诱人，多少年来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好的，许多人并热衷收藏。现代人物中如鲁迅、郑振铎等都喜欢收藏并介绍、推广。

恒板彩印艺术现在已走向世界，作品广及五大洲。

十七、清代的公私雕板图书

清代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期在帝国主

义入侵后，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西方文化随之传入。清代前期、中期，仍是以雕板印刷为主，并在试验采用各种活字来印书。

清代帝王为缓和民族矛盾，笼络了一批文人，组织撰写和校注图书，帝王并“亲自”批阅，称为“钦定”或“敕撰”、“敕编”，康熙首先这样做，其它帝王也仿效。

康熙十二年（1673）命廷臣补刻了明代经厂本的《文献通考》，在武英殿设修书处，校对官吏、写刻工匠均聚此处，由翰林院词臣总负责，所以“内府本”在清代称做“武英殿本”。

武英殿本中有康熙十六年（1677）所刻库勒纳等奉敕撰的《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四十年（1701）刻《清凉山新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等。昭槁《嘯亭杂录续录》他说：“万机之暇，博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自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仿模规范。”

高宗以右文为治，学习康熙，主持刻书，当政六十年，据《殿板书目》已刻书达百种，包括《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嘉庆后数量减少。

武英殿本还有实录、圣训、御制诗文、御纂经典、会典、方略等书。

武英殿以外，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也是官刻图书中心。曹寅，字子清，一字栋亭，号荔轩，汉军镶蓝旗人，为曹雪芹之父。康熙时，官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同时主持扬州诗

局，并校勘刻印图书。其中有《全唐诗》、《佩文韵府》、《词谱》、《历代诗余》、《全唐诗录》、《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题画诗类》等数十种近3000卷。

清朝统治者虽为满族，为了加强统治，学习明代，以《四书》八股文开科取士，禁锢思想，笼络知识分子。武英殿、扬州诗局等中央出版事业所刻印的图书，缮写工整，刻工细致，并选用好纸，精工装订，质量很高。但图书内容除“御诗”、“御文”外，均为正经、正史之作。

清代中期以后在地方上开设“官书局”作为官办的图书出版机构，况同仪《蕙风簪二笔》中记有：“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复安庆，部署确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既复江宁，开官局于冶成山，此江南官书局之肇落也。”此江南官书局即以后南京之国学书局。《中国雕板源流考》又记：“自同治己巳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同时设局后，淮南、南昌、长沙、福州、广雅、济南、成都继起”，共有十四家，除此以外，在学校未兴以前，各书院为研究高尚学艺之所，也梓行书籍者甚多。如昆明有育材书院及五华书院，所刻书各一二十种，尤以晚起之南菁书院、两湖书院、格致书院新刊之书为多，是我国倡兴新学之前锋。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所刻南昌学官本《十三经注疏》，是清代官本之代表，为《十三经注疏》诸本中最足信据者。因为阮氏当时参考历来之印刻本，远起汉、唐、后蜀、宋之石经本，蜀刻大字本等诸种刊本注疏，近及明代南监本、北监本，明修宋元诸刻本，毛晋汲古阁本与阮氏以前清人校刻诸本，且参

校日本山井鼎、物茂卿之《七经》、《孟子校文》等。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立了广雅、粤华、粤秀三个书院和学海堂、菊坡精舍合称五大书院，出版了《广雅丛书》、《原珍成丛书》、《全唐文》等，藏板多至十五、六万片。

清代训诂学日渐盛行，并扩大了校勘学和考据学，在目录学中也产生了版本目录学，因而在图书出版方面大量整理、校勘古书，对我国二千年来的古籍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理。

乾隆初年，重刻《十三经注疏》及二十一史，每卷后都有一篇考证。此后，一批考据家都精于小学，其中段玉裁、戴震、桂馥、钱大昕、孙星衍、顾千里等人最著名。孙星衍认为：“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通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所以清代学者认为经注到唐代时做的“疏”也罢，“正义”也罢，多非汉人家法，所以清代学者重新写了许多“注疏”、“正义”。

他们在学术上尊汉，在版本上怀疑宋版，从而兴起了“校勘学”，其中顾千里可为代表。他校勘整理出版了一批著作，包括抚州公使库本《礼记》，仿宋嘉泰本《盐铁论》，北宋本《骆宾王集》，宋刻本《刘氏诗说》等。他校刻时，选择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他认为宋本也难免有错误，所以要用几个本子互校，在校勘过程中总把考异，识误记录下来。这对于正确地继承文化遗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如黄丕烈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黄丕烈，字

绍武、号堯圃，以校勘闻名于世，凡他所鉴定的书最有权权威性，为它人所尊重。他自己所刻书为《士礼居丛书》。

私家刻书在清朝极盛行，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中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以为己，刻书以利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张之洞又进一步认为刻书必须要精，他在《书目答问》中说：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因而许多图书有的请名家书写，精工梓刻，有的访求宋本，依样重刻称“影宋本”。这种“影宋本”虽始自明末，但到清乾、嘉时代更为精审，几乎可以与宋刻原本丝毫不差。清徐康《前尘梦影录》说：“乾、嘉之时，有许翰屏者，以书法擅名，当时刻书之家，莫不烦其挥笔。苟有一技，洵足以名世矣。黄丕烈、孙星衍及其他诸家所影宋本秘籍皆所手写。嘉庆中胡克家刻《文选》，校书者为彭兆孙、顾广圻，写影宋字者即许翰屏，诚极一时之选，即今所谓胡刻《文选》者也。”清代藏书家差不多都喜刻书，仿宋、元本有绝精者。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汪士钟刻宋景德本《仪礼单疏》及元泰定本《孝经疏》等，晚清陶子林（同）以刊影宋本书名于世。金陵、苏、杭等地，甚至湘、鄂，也有诸多私人刻书甚精。

坊刻书中的著名者，如苏州的扫叶山房，从明代直到民国，出书甚夥。苏州是出版中心之一，刻书以小说为多。另

外南京的李光明庄、聚锦堂，北京的老二酉堂、善成堂、文宝堂，苏州的宝兴堂、绿荫堂，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群玉山房等都出了许多书。清代坊刻本，书前开始有封面，刻工不精，但有许多书是官刻本所不愿刻的。

“丛书”这一类型在图书出版中也以清代为盛，几乎成了一种风气，郑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说：“总计清代丛书，实在二百部以上，平均每年有新刻丛书一种。各丛书子目，多者数百，少者数十，或为古书，或为佚书，或属近者，使综合其书卷于一处，当无愧于汗牛充栋之一语。木版印刷之进步，至此可云极矣。”从这些丛书的性质来分，有综合性类编，如《百川学海》、《汉魏丛书》、《士礼居丛书》等；有一人自著丛书，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等。

这些丛书从内容上来划分，有辑佚丛书，如《汉魏遗书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有郡邑丛书，如《盐邑志林》、《台州丛书》等；这还不包括专科性丛书在内。

十八、西方机器印刷术的传入

西方国家的印刷术在15世纪开始使用，德国人谷腾堡在1440—1448年期间发明了活字机械印刷，他虽然大大晚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但它选用的活字材料比较优越，是一种铅合金，并且开始用简单的机械印刷。

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的工业，从传统的手工操作经历了机械化的革命，印刷术从不例外，各项印刷技术先后发明。这时期的中国工业却处于停滞状态，更由于政治上错误地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方针，不能与其它国家交流，也不愿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印刷术从而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近代、现代广泛使用的印刷术——以铅活字为主的机器印刷，是清朝末年19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人士不断来到中国，西方的文化在寻求机会向中国传播其影响，基督教作为开端，首先进入中国，在向中国传教时，就需要有中文的图书。清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来传教，积极交往中国人，努力学习华语，他编辑了《华英辞典》，翻译了《新约》，准备印刷，就雇了中国人制造字模，但当时清政府统治很严，未能成功，这只是一次尝试。

嘉庆十九年（1814）马礼逊改在与中国邻近的马六甲设立中文印刷所，用西方的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印刷中文书籍，这是机器印中文图书的开始。此后，各国传教士在南洋及澳门等地印刷中文图书。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进行文化宣传，一方面中国的有识之士，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图中国自强，这两方面都需要以图书做为工具，机印图书技术遂迅速推广。

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在澳门建立了花华圣经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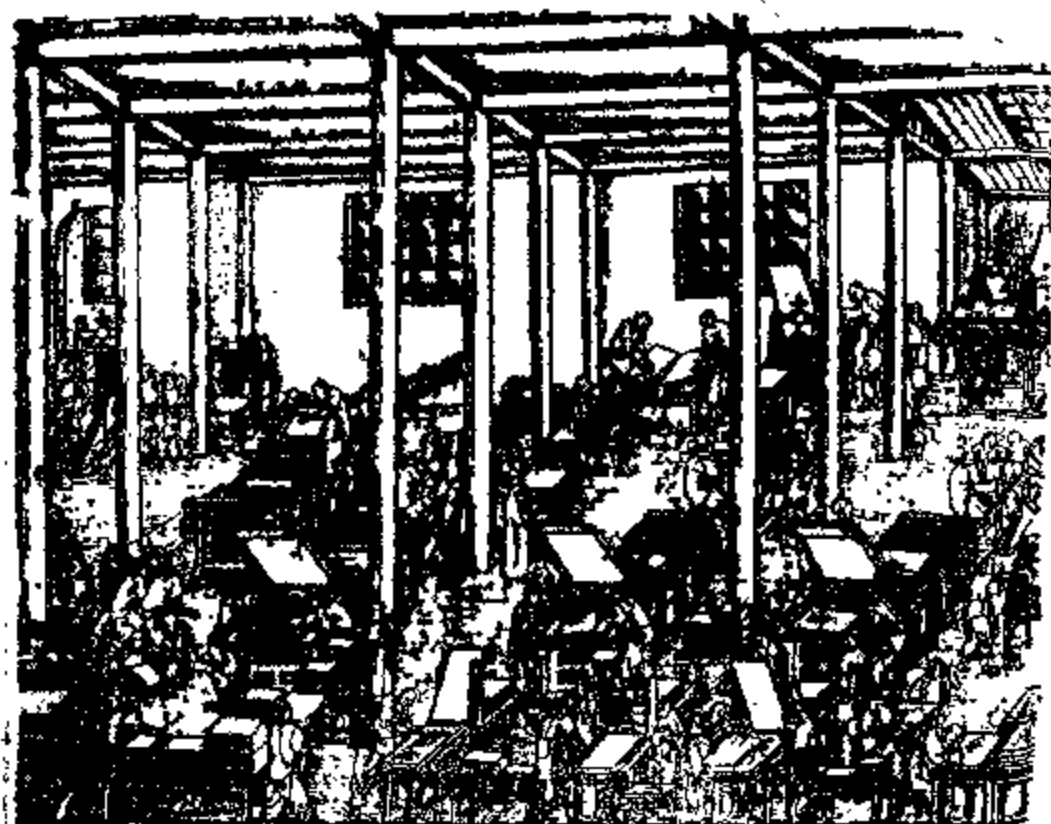
印刷中文图书，主要为教会书刊，次年迁到内地的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接着有了中文铸字机、中文排字架。

机器印刷在一些开放口岸如上海等地先后建立，当初接触这一新鲜事物的人曾写诗以记：“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千陇耕书田。”这是对初期机印图书情景的写照。

我国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即属于凸版印刷术，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使用最广泛的印刷术。所谓“凸版”是把字刻在版上，然后复纸以印，如用黑色的墨，那么字着黑色，印出了“白纸黑字”。

西方传入的机器凸板印刷术，开始是用铅——合金铅活字。首先要“铸字”。我国的活字印刷，对每一个字都要刻制。西方印刷术每一个字的同样字体，同样大小，只刻一个字，然后用铸字机大量铸造，再按一定的排列方法排在字架上，印书时手拿文稿从字架上依次取字，排成版。有一种印刷术直接用这种版来印刷，由于铅字在印的份数过多之后角划易磨损，多数图书是把排好的板压成纸型，即将纸型覆在排好的板上，加热加压，这样单个字拼成的板压成一整块的纸型，纸型上的字由凸面正体成为凹面反体，最后再将合金铅熔化浇在纸型上，制成了整块的正字铅板，以这种铅板用机器印刷，一种书印的本数多可以浇几副铅板，书印完以后保存纸型，什么时候需要再印刷，取出来再浇板即可。（见图十四）

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人马施曼为印《圣经》，托



图十四：清代上海的印刷厂

汤姆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道光十四年(1834)，美国教会在华盛顿浇板制成中文活字。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教会在澳门铸中文字，分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并创造了“元宝式”排字架；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加以改进。

纸型是18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的，我国在光绪中叶开始采用，日本人曾在上海开设修文印书局用纸型印书。

用于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最早是手扳架，每天印数只有几百张，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报馆开始有手摇轮转机，一个小时即可印数百张，光绪年间进一步有电动轮转

机，每小时可印1000多张。

凸板印刷术中还有几种。电镀铜板为1846年美国人魏尔考士发明，清朝末年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首先采用这种方法。同治九年（1870）在上海的傅教士又创造了石膏板，但未能广泛传播。光绪三十年（1904），商务印书馆还创造了黄杨板，也因价格昂贵而未能发展。

照相镀锌版也属于凸板。1855年法国人稽禄脱发明了这种凸版印刷术，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土山湾印刷所试用成功。这使得图片的印刷有了很好的途径。

平板印刷，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印刷术，它不需要刻，铸“字”，而是用化学方法将字或图附于一个平面上来印刷，目前图画的出版，大多采用平板印刷术。

“珂罗版”是一种流行广泛的平板印刷术，“珂罗”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意思是胶质印刷，以后发展成为胶版印刷，现在的彩色图片仍多用此法。珂罗版为德国人海尔拔脱于1869年发明。我国于光绪初年（1875）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首先采用，开始是用来印圣母像。不久，上海有正书局聘日本技师传授珂罗版技术，光绪二十八年（1902），文明书局的中国工人也试验成功。在单色基础上，又发展了彩色珂罗版印刷，甚受欢迎。

1796年发明的“石印”是一种流行最早的平版印刷术，我国于光绪二年（1876）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开始采用石印印刷术，主要印宗教宣传品。接着上海成立了点石斋石印书局从事石印图书的出版，如雕板《康熙字典》，几次雕

印印数受限，用石印后点石斋的两次即印10万部，为我国第一种印量最多的图书，他们还印了石印本《二十四史》，流行也很广。

光绪七年（1881）又成立了国文书局，一举购石印机12部，成为大型石印书局，其出版的《佩文韵府源流》等很具特色。

光绪三十年（1904），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相继建立彩色石印，印刷出版了许多美术作品。

1859年发明了照相石印，我国于1920年开始使用。照相石印，亦称影印（初期的影印术），先用照相术，再用石印术，可以把古书任意缩小、放大，而保存了原有面目，不失毫发，大受欢迎。

凹版印刷，实际上应溯源自我国碑碣的拓片，现代凹版虽然是用雕刻金属板的方法，其原理还是一致的，即文字或图画低於版面，不同处是墨刷在凹进去的字或画上。这种凹版主要用来印以图画为主的图书。

凹板中的雕刻铜板发明最早，始于1452年的意大利，最初用来复印名画，我国王肇铤曾在日本学雕铜板并写有《铜刻小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开始用此印书。

机器印刷术的传入使图书的出版量大大增加，扩大了知识的传播。清代虽然使用了机器印刷术，但多数图书还是单面印刷，采用线装，随着西方造纸术的传入才逐渐改为双面印刷，同时在装订上改而为平装、精装。

十九、翻译书小史

世界各族人民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了进行文化交流，就产生了翻译图书。我国古代接受佛教文化很早，佛教在汉代已经传入中国。这时我国图书事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了我国最早的译书，即译经事业。安世高是第一位译经的人，严佛调、安玄等相继从事这一工作。《译书经眼录·序》中说：“域外文字译行于我国，传播于现今者，如《象教经论》则始于晋。”南北朝时的梁代，僧祐编有《出三藏记集》，是佛经目录，可见这时翻译的佛经众多。如西晋时的竺法兰，以后的法显、玄奘都以译经著称。但是佛教以外的外国著作则没有被翻译引进。

到了明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宗教、语言等方面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图书。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来，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翻译的图书不下20余种，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自然科学中译本。

其后，庞迪我、艾儒略、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来我国以后都翻译了一些图书，以宗教书为多，兼及其它。外国传教士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出版，翻译的《重学》是第一部力学著作，《光论》是第一部光学著作。

清代后期，译书有了很大发展，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訢请设立机构以培养外文人才。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是一所培养外文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外文图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组为译学馆。他们先后翻译了大量图书，包括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自然哲学》、《数学物理学》，毕利幹译的《化学初步》、《拿破仑法典》，汪凤藻译的《英文法》等。

江南制造局虽为一机械制造厂，也从事译书，1867年无锡徐寿、华蘅芳“创议翻译西书，以求制造根本”他们认为利玛窦以后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而中国人均不知道，急需将西方文献译成中文，经过请示、研究，在制造局内设立了“翻译馆”，于1868年开馆，从事译书，据1909年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所载，至此共译书178种，为数不少，其内容包括算学、汽机、化学、地理、医学、水陆兵法、造船等方面。参加翻译的外国人有伟烈亚力、林乐知、金楷理等人，我国有李凤苞、李善兰等人。

另外，如上海广学会、广州方言馆、福州水师学堂也翻译了一些图书。为了加强译书工作，马建忠于1896年在《拟设翻译书院》中说：“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于其文字之征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悉其名称。……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这是译书中的实际问题，它影响了译书的质量。盛宣怀也一再上书，他请求设立译书院，提出：“中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

在强中之中，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类书最少；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已非时物，出了当时译书存在的问题。他同时认为“论译书则天算、制造较难，论选书则政治、史学较难”。

鸦片战争以后，翻译图书的内容，除介绍国外科学、技术以外，同时翻译社会、政治方面的图书。卢梭的《民约论》等译成了中文。在这些译书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批要求政治改革，直接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的图书，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何启的《新政真诠》、陈炽的《庸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

清代末期，译书已从早期的以传教士为主、以外国人为主或中外合译，发展到主要由中国人翻译。出现了一批以译书为主的翻译家，内容除政治、历史、科学、技术以及宗教方面图书以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不少。

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家中可以严复为代表。严复（1853—1921）中外文造诣均高，所译图书虽不多，仅有9种，但影响深远，因为：一、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二、译书凭一人之力，不借助于他人；三、文笔精致。他提倡翻译信守“信、达、雅”三字，信为译文准确，达为通顺，雅为雅驯。他的译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文艺作品的翻译家中，以林纾为代表。林纾（1852—1924）字琴南，一生译书甚众，达167部之多，其中有法国小仲马

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见图十五）、《黑奴吁天录》等。



图十五：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遺事》

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遺事，光緒辛丑（一九〇一年）玉清瑞慈館汪慶鉅家刻本。

他的译书是由别人将外文原意译给他听，他再用中文整理。

在辛亥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翻译介绍到中国来，1902年的《新民丛报》18期已介绍了马克思，1906年1月的《民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清朝中期以后翻译图书大量出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大体有四种：

第一，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们在大炮军舰的军事侵略前后，也利用翻译图书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外国的传教士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方面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历史和科学图书。

第二，在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清政府屡遭失败，被迫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出现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他们一味崇拜西方，提倡学习外语、学习外国技术，也为此而翻译了许多图书。

第三，我国的维新派，为“变法图强”，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以期振兴中国，也主张翻译图书，如顾燮光说：“清光绪中叶，海内明达，愆于甲午之衅，发愤图强，竟言新学，而译籍始渐萌芽。”积极主张翻译图书的可以“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梁启超为代表，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中说：“……《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悉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匪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方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随着译书的增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成立了“译书公会”。在它的章程中首先写着：“本公会之设，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考各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从前所译各书，仅等九牛一毛；兹已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与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期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兢兢焉。”

第四，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私人译书日见增多。译书销路好，又刺激了出版社出版译书。

古代的译书，其语言文字，主要是古代语文，与现代语言文字尚有差别，所以“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古代翻译的图书大多又有新译本问世。

明清两代的翻译图书，在形式上仍是采用的线装，清中期以后逐渐采用西方传入的铅活字印刷术，却仍用单面印刷线装，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由平装所代替。

二十、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期刊”一词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狭义的指“杂志”，广义的包括“报纸”，指定期与不定期的出版物，是图书的一种类型。实际上在近代报纸与杂志较难区分，而现

代则已成为两种类型，期刊与报纸已经有了区别。

我国早在汉代已经有了“邸报”，是将京城中的军国大事传录抄送外地的一种形式，这实际上与现代的报纸有相似之处，以后各代都有类似的形式，叫做“宫门抄”，“京报”等名称，印刷术盛行以后，从手抄改为印行，更接近于报纸。到了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影响下，叫做“官报”，辛亥革命以后叫“政府公报”。

（一）杂志

现代形式的杂志，最初是清朝时期外国人创办的。清代中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越来越多，当时的清政府不准在中国传教，也不准在中国印书，於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隔中国较近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了一种中文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种杂志，它创刊於清嘉庆二十年（1815），停刊於道光元年（1821），内容并不是单纯的宗教刊物，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期刊。

第一个时期的中文期刊都是外国人在中国以外出版的，继《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后，接著有《特选撮要》（Monthly Magazine）、《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等。

最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杂志是《中外新报》，半月刊，咸丰四年（1854）创刊于浙江省宁波，1860年停刊，内容为宗教、科学、文学，每期四页，从形式上看实际上是一

份报纸。

以后,《六合丛谈》创刊於咸丰七年(1857),《中外杂志》创刊於同治元年(1862),均在上海出版。此后几十年间,上海是我国报刊出版的中心地区。

在画报方面,最早的是光绪元年(1875)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以后陆续有《寰瀛画报》等,而以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影响最大。

“戊戌变法”前,我国有识之士,开始利用报刊进行政治宣传。如1895年北京强学会出版了《中外纪闻》,康有为、梁启超经常为其撰稿,后遭到清廷查封。上海强学会于同年还出版了《强学报》,次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是推动维新运动的舆论工具之一,销行达万册,在当时是罕见的。1897年严复主编的《国闻部》在天津创刊。

“戊戌变法”虽遭失败,但报刊的出版方兴未艾,越来越多。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刊了《东方杂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杂志,曾出月刊,半月刊,它一直连续出版了44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才停刊,是我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种杂志,近年来已影印发行。

除综合性杂志以外,各种专科性杂志也陆续出版问世。早在1902年,创刊了文学刊物《新小说》,1906年又创刊了专科性的理科刊物《理科杂志》,《图书月报》也在这年创刊。1909年创刊了我国第一种教育刊物《教育杂志》,1910年创刊了《地理杂志》,1911年创刊了《法政杂志》。在辛

亥革命以前，我国已有了众多的杂志出版发行。

上述的《新小说》以及另外的《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合称“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发行量大，影响广泛。清末是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最盛行的历史时期，与这些小说刊物的出版也分不开。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起初同当时的许多文学刊物一样，以发表通俗小说为主，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锐意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一种重要文学杂志。

（二）报纸

我国出现近代报纸的初期，主要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我国现代日报之产生，亦发端於外人。盖斯时商务交涉日繁，其材料非杂志所能尽载也。香港之《孖刺报》，於民国前五十四年（咸丰八年）即西历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提议，增出中文晚报，名曰《中外新闻》；始为两日刊，旋改日刊，为我国日报最先之一种。继之而起者，为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德臣报》之《华字日报》；上海则有字林洋行之《上海新报》与《沪报》，英人美查（F·Majer）之《申报》；丹福士之《新闻报》；天津则有德人德 璿琳（S·Detring）之《时报》，及汉纳根之《直报》；北京有德人毕连士之《北京日报》。”其中《申报》创刊於同治十一年（1872），原为英人美查创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由中国人接办，到1949年停刊，是我国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种。

我国人创办的报纸中，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

主编的《时务报》，对宣传维新变法影响很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谕：“……将官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飭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飭地方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后於光绪二十六年（1900）再次下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的《苏报》，后为光复会主持，章太炎、蔡元培等借以宣传革命，清廷又下旨：“……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

清末的报纸已为活字印刷，但大多仍是继承传统的图书印刷——即仍是单面印刷。

辛亥革命导致了封建制度的灭亡，自此至五四运动，是中国图书史上的过渡时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白话文运动。此际中国图书从印刷技术，装订形式，写作用语和内容来看，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要进入中国现代图书发展史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古代图书

作者 =

页数 = 1 2 3

S S 号 = 1 1 0 2 2 5 8 3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